

水美浙江

□邱志荣

“稽山何巍巍，浙江水汤汤”。图文并茂，精美雅致的《浙江水文化》(季刊)改版是浙江水利、水文化界的大事和盛举，为文化大省再添光辉，可喜可贺。

浙江原本“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支津交渠”之地。水环境的变迁、人们的治水活动对这里的文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次海侵至今，钱塘江两岸已成沧海桑田之变；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良渚文化遗址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大禹治水两次来越，“毕功于了溪”，“地平天成”，奠定中华水文化基石；越国建“山阴故水道”，是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两条人工运河之一；之后，东汉建鉴湖、筑防海大塘，梁修通济堰、唐建它山堰，除害兴利，水利成就杰出，浙江人民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就繁华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浙江水利光辉业绩，世所瞩目；进入本世纪，浙江水环境治理又有开拓和创新，建设和文化并举，成就其伟大功业。

实践证明，水文化内造灵魂、外塑形象、融合百家，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然水文化建设任重道远，期望《浙江水文化》引领学术前沿，成为我国水文化的优秀综合性期刊，这就需要编辑部和同仁们持之以恒，共同努力，培育并珍爱这一展示水文化形象的窗口和园地。

一、重视区域性基础研究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水文化的基础。提倡以科学的思路方法、多学科的研究，正本清源，系统整理、保护本地水文化历史资源，写出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原创性的好文章或专著。

二、在实践中传承、弘扬发展水文化

经世致用是水文化的目标、方向和生命力所在。为此要重视基层普及，形成水利人传承、弘扬水文化的共识和自觉。其次，要建设精品工程。当前要以中国大运河、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美丽河湖”为重点，建设一批生态优越、环境优美、文化深厚、宜居宜游的经典工程。再则，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多学科的专家参与水文化研究和建设必不可少，但是，水利系统内必须培育一批事业心强、业务素质好、文化造诣深的人才队伍，从而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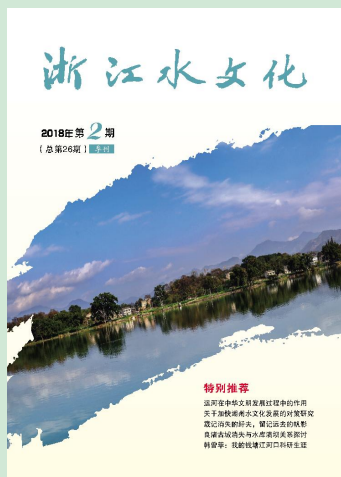
三、创新水文化理论体系

水文化建设提出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已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我国正在努力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行业特色的水文化科学体系，为此，同仁们要有理论创新意识、集聚优势能力、拥有国际视野，以弄潮儿的气魄，积极利用《浙江水文化》这一载体平台，为形成我国水文化百花齐放、星光灿烂的新局面、新格局再创佳绩。

(作者：绍兴市鉴湖研究会会长)

浙江水文化

2018年第2期(总第26期)



刊名题字:叶舟

主办:浙江省水利厅

承办: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任:马林云

副主任:蒋如华 李锐

成员(按姓氏笔画):

王春来 邬杨明 江海洋

陈永明 严齐斌 张志荣

周红卫 范波芹 赵法元

宣伟丽 柴红锋 涂家焰

钱燮铭 符宁平 梁国钱

葛捍东 董福平 虞开森

裘江海

卷首语 JUAN SHOU YU

1 水美浙江

邱志荣

理论前沿 LI LUN QIAN YAN

4 运河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邹逸麟

水事动态 SHUI SHI DONG TAI

13 砥砺前行履治水之责

——基层河长谈治水感悟

方晓晶

16 打好组合拳 全面深化河长制

——以衢江区廿里镇为例

徐雨玫

18 金华被批准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

20 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辛识平

21 浙江丽水:打造瓯江国家河川公园 建幸福大花园

记者 罗雪斌 通讯员 汪小阳 蔡麒麟

学术论坛 XUE SHU LUN TAN

26 西方早期水文明的构建及其影响

郑晓云

30 良渚古城消失与水库溃坝关系探讨

周黔生

ZHEJIANG

目 录 CONTENTS

学术论坛 XUE SHU LUN TAN

- 34 关于加快湖州水文化发展的对策研究 罗安生
- 41 曹娥因人名江的经济解释 蒋剑勇
- 44 近世以来余杭北湖的治理及变迁研究 胡勇军

水利纪事 SHUI LI JI SHI

- 48 载记消失的纤夫 留记远去的帆影
——云和水文化遗产调查纪实 王锡彪
- 51 韩曾萃:我的钱塘江河口科研生涯 李海静 王 森

文化鉴赏 WEN HUA JIAN SHANG

- 55 妈祖信俗:“一带一路”的中国式故事,国际化表达 车 弓

水韵艺海 SHUI YUN YI HAI

- 58 水上乡愁 黄美丰
- 61 鹤溪 他 他
- 64 夜宿浙江 唐·孙 逖
- 64 越中秋怀 唐·李 白



封底

主 编:符宁平
副 主 编:闫 彦 顾蓓熙 蒋剑勇
责任编辑:雷水莲 叶洪明

编 辑 出 版:《浙江水文化》编辑部
内部准印证号:浙内准字第 0235 号

SHUIWENHUA

运河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邹逸麟

人们常说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然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就运河延伸路线之长,维持时间之久,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在世界上则是独一无二的。



大运河实景

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当时的运河已经沟通了黄、淮、江、钱塘、珠五大水系。公元3世纪的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公元7世纪的隋唐时代,当时北抵北京、西达西安、南至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的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也计在内,则又要加上120余公里,无疑为世界之最。

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秦始皇时代开凿的沟通湘、漓二水的灵渠,至今仍有航运、灌溉之利。今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最早形成于秦代,更是当今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水运航路。较晚的形成于13世纪的山东运

河,在今天济宁以南的鲁南运河段,仍然担负着苏、鲁之间重要水运任务。历史上人工运河的航运功能维持如此之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中山东运河段沿途山峦起伏,全长约300公里。因地处山东地垒西缘,运河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沿运需要分段建闸节水,才能通流,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是世界上任何一条运河所无法比拟的,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

如此宏大规模和悠久历史的运河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这一系列运河的开凿,曾经为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为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同时客观上为古老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对多民族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的贡献

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民族众多,各以农耕、畜牧、游猎采集经济为生,各有其活动、生存的地域,区域间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对于有如此强烈的自然和人文地区差异的国家,如果春秋战国时代分裂的局面长期延续下去,最后没能形成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那末世界唯一能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不可能由此产生、形成和巩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各国间战争频繁,互相攻伐,而又互相交往。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为了弥补我国北方大部分天然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限制,于是就出现了主要为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为什么我国运河最早出现在河淮之间,如春秋时代楚国的扬水、吴国的邗沟以及战国时代魏国沟通河、淮的鸿沟运河?因为这里是我国南北经济和文化的过渡地区,由此反映人们很早就有沟通南北的需求和意图。



古邗沟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政策,为统一帝国的巩固打下了基础。此后。两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除了明初的二十几年外,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当时王朝的国防边境又在北部蒙古高原的南缘。唐代中叶以前,我

国的经济重心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中期安史乱后,直至宋代,我国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都需用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而漕运最理想的运送方法是水运,因此,开凿人工运河和维护其正常运行,成为历代王朝最关注的水利工程。

居住在历代王朝首都的皇室、勋戚、宦官、军队、富商大贾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色人等形成的庞大消费群体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必须通过漕运从全国富庶的各地攫取而来,水运是最廉价运输方式,而运河则是为此服务最好的工具。与此同时,“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诸如国家政局的稳定、战争的成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畅达、区域社会的开发、社会生活的安定等等。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发挥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动能,粮食的运输仅只是漕运的一种形式,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调节器,对社会进行广泛的调控,对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和失衡的社会现象,统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运(或漕粮),以达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运还起着一些不属于封建朝廷控制范围、客观上却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成市区的繁要、促运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由此可见,运河在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里,已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而在客观上起了加强了巩固的维护统一帝国的作用。因此,运河的修建,并非汉族为中心王朝的专利,也不受传统交通所谓“南船北马”的理念的影响。北京附近的通惠河,就是女真族定都中都(今北京)时修凿金口河的延续。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开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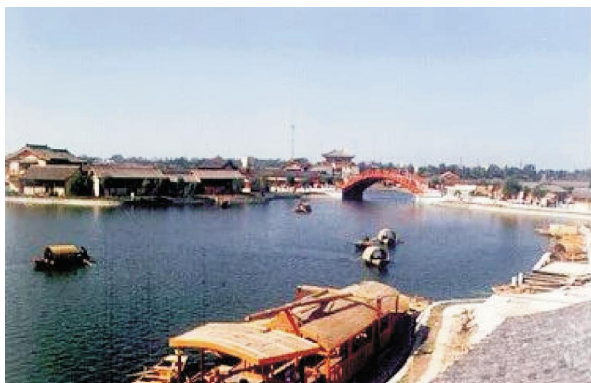


《漕运图》

隋炀帝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王朝与分离了三个世纪的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至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部），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运送集中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征伐高丽的需要，保卫北方的边陲。南北大运河对隋统一王朝极具建立和巩固，无疑是起了关键的作用。

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但“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天宝末，安史乱起，州县多为藩镇割据，贡赋不入朝廷，中央府库耗竭，朝廷粮食发生极端的恐慌。贞元初，关中“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贞元二年（786年）久阻的汴河一时畅通，江淮3万斛米运至陕县（今县西南），唐德宗在长安闻知后，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汴河的通塞对唐王朝命运攸关的情景，从德宗父子溢于言表的赤裸表现而暴露无遗。唐末黄巢起义平后，全国各地均为军阀所据，“皆自擅兵赋，……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王夫之说：安史乱后，“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根本

也。”盖指运河延长了唐朝的生命。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的功能有不同看法。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虽然对运河的功过评介不一，但认为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



汴河

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恢复元代以来京杭大运河，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是明代大臣论及漕运问题的奏章里最常普遍、常见的用语。刘天和《问水集》卷五《治河功成举劾疏》：“臣窃惟运河国计所系，凡宗庙军国之需，营建宴赏之费，与夫四夷薄海之朝贡，京师万姓之仰给，举由是以达。”当时燕京“九重之供亿，六军之储需，咸取急焉。所赖以灌输者河道也。”每年漕运之京师“岁江南四百万之粮，以给官

军数十万之用,上有关于国计,下有系于民生。”此非仅指朝廷而已,而是京师亿万民众生活所需皆仰给出于运河。所谓“京师之地,素称瘠土,衣食百货仰给东南,漕河既废,商贾不通,畿甸之民,坐受其困。”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交通运输线,几乎所有中国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能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清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其统治,朝廷官吏实行汉满双轨制,故机构庞大,京师附近十多万八旗驻军及其数十万不劳而食的家属均由朝廷供养米粮,故其需求远超过其他朝代。漕粮的另一支付,是全国各地驻防军饷。

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途经白河,“这一天里,我们从许多运粮去北京的帆船旁经过,其数量之多,运输量之大,与以前使团的作家们所做的描述完全相符;这些帆船排列的方式和顺序,其情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沿着河岸整齐地排成一排停泊在那里,我们溯流而上时,迎面看到的是它们那高大、装饰讲究的方形船尾。”十九世纪的西方人可能只是从经济角度来观察帆船的数量和运输量。他们不了解,这一成排帆船,实际是清王朝的生命线。

综观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并能延续二三千年,没有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二、对中华文明内涵吸纳包容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大凡一种文明要具有久长不衰、连绵延续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融合、吸纳各种文明的胸襟和能力。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的政治实体,她须要有两种融合和吸纳:一是对域内各区域不同文明

的融合,一是对域外文明的吸纳和交流。



秦汉以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措施,是通过行政手段达到的,但民间的生活习俗,如饮食、服饰、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却不可能完全通过行政手段溶合。故秦汉以来,我国文明南北差异还是很大的。有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的特点。要消除这种差异,主要通过人口迁徙、商品流通和文化的交流,而运河在其中起过重要有作用。

春秋战国以来,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已具相当规模。西汉时代商业贸易最易致富,谚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此类商品的流通,大多借助于运河。当时重要的商业都会,如洛阳、临淄、定陶、睢阳、彭城、江陵、吴、寿春、宛、番禺等等,皆在运河沿线,可以为证。

从西晋末到北宋末八百年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迁,北方人的饮食起居、生活习俗、行为观念也随之进入南方社会,影响了南方社会中经济、文化方面的北方因素;同时诱发了北方社会对南方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强烈渴求。故一旦南北统一王朝的建立,南北文化和物资的交流便成为社会各阶层强烈需求。运河的开凿和南北大运河水系的形成为这种需求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

隋唐南北大运河的修凿,为各地区之间物资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便利。“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里万艘,交贸往返,昧旦永日。”唐代天宝元年(742年)在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筑

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从东京、商丘等地取南方来的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每只船都表上南方各地的署牌,并陈列该地土特产品。这样表有各地署牌的船只,地域包括了南方数十郡。一个偏隅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城市,居然能通过运河展示了南方各地的土特产,让京城长安人民大大开了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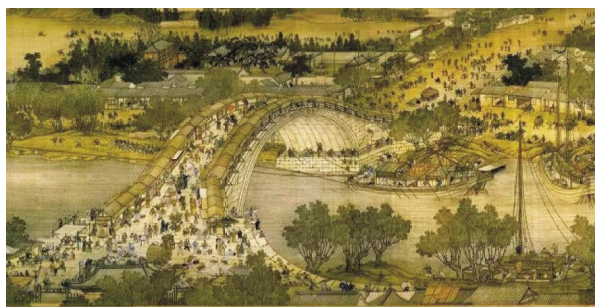
最典型的南北文化交流的是,要算南方的茶叶北销及饮茶之风在北方社会兴盛,成为唐代北方士大夫间最流行的习俗,所谓当时“风俗贵茶”。唐人封演说:茶“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兴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自江淮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大量南方的茶自汴河运来,汴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茶

宋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各地商品借运河之便流通于各地,较唐代更为发达。开封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又集中了当时社会上当高层的消费人群。因此这个城市的物资供应最能反映当是南北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当时开封周围的漕运四渠,《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运河上的繁荣。宋代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与运河的畅通,有极大的

关系。由于水运发达,开封城内市民只要有钱,也能吃到江浙的大米(秔稻)。不仅如此,在首都开封,普通人也能吃到从运河运来的南方海鲜。《东京梦华录》卷四《鱼行》:“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担。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清明上河图

因此,每一时代为谋求利润的行商,必定曾携带商品希望通过运河到达当时可以到达的最远处,从而使运河带动了水运发展作用的最大化。尤其隋唐以后系统的大运河格局的定型,逐使海、河、淮、江、钱塘诸水系及其沟通的各天然河流,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全国性水运交通网。由于水运的成本低廉,于是借助运河水系的便利,除了朝廷最关注的漕运外,附于漕运的各种物资以及商贾以赢利为目的各地物资交流大大加强,东西南北商品的流通,实际就是含带着各地文化的交流。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城民阶层的出现,对商品需求空前增加,这种形成规模的商品交流促进了宋朝全国商品市场得以形成。以商业贸易为驱动的民间日常商品的贸易流通,则是对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影响较大。

明清时代的我国南北地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人崔溥来华,曾从杭州由运河直抵通州,一路上对运河沿线南北城市的风情差异,“将运河南北部之间在市井风貌、第宅质地、饮食起居、衣

帽服饰、文化程度、仪容打扮、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以至对于农工商业的态度,从事程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用品、利水资源的运用等,均作了具体而又形象化的论述,一幅明代中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貌画卷跃然而展现在人们面前。”

明清时期通过大运河而达到南北交流的物资,主要指政府规定运军随漕船所带的土宜。明清两代都规定漕运军卒随漕船北上时,可以随船搭载一定数量“土宜”,沿途贩卖,“免其抽税”。这种土宜的数额曾不断地增加。明万历时增至60石;在清代,从康熙时60石,道光时增至每船土宜180石。道光年间漕船以6326艘计,共有免税土宜1138680石。据清杨锡绂《漕运则例纂》记载,土宜品类繁多,大致有农产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各种食品、纸张、竹木藤器、各种杂货、铁铜器、药材等11类,数百种。此外,有窑货、扫把、木岸、竹子、杉篙、木头等物,“俱不算货”,即可任意携带而不纳税。这些商品或沿途出售,或运至北方售卖,活跃了运河沿线经济的流通,并通过运河沿线各城市各条水路或陆路,如同血管一样输到北方各地。漕船至京师卸粮后,回空船所载各类货物。回空船所载商货主要是北方的农产品及农副产品,如梨、枣、核桃、瓜子、柿饼、豆、麦、棉花、烟草等。手工业品较少,携带数量,每船60石免税,仍按漕船6362计,共有免税商品379560石。在规定数量外应纳税,每石税银4分。回空船所纳税很低,每100石才收税银4两,当时所带货物一定不少。大量南北商品在沿运河城市间流通,于是运河沿线出现了大批商业贸易城市,从天津南下,有德州、临清、济宁、聊城、徐州、淮阴、扬州,过江以后从镇江、常州、苏州、嘉兴至杭州,一路繁华。而这些城市由于商机繁盛,聚居了大量外来人口,大大促进了南北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至于随着沿运人口的流动,沿运各地的区域人群、宗教信仰、饮食起居、语言习俗、地方戏曲等

等在运河沿线的流布,则成必然之事。比较典型的像天津这样一个原先只是一个军事据点,由于地处大运河的枢纽,运河上南来北往的人员众多,在天津附近能听到的是于南腔北调。明代在天津独流镇、杨柳青、直沽口等的运河上能听到“吴歌”、“楚歌”、“闽语”、“南腔”。在清代天津城内有广东、福建、宁波等人移居,成为“五方杂处”之区。近代以来,天津成为北方曲艺中心,无疑是因为北方诸地劳动力都集中在天津码头之故。还有运河供奉的金龙大王神,为北方河道之神。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谓:“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大王庙。”“永乐中,凿会通河,舟楫过河,祷无不应。于是建祠洪上。”运河沿线各地无不供金龙大王庙。可见大运河在沿线文化交流和传布方面起过重的作用。这种文化的融合,无疑会加强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金龙大王庙

贰

中外文明的沟通、融合的作用。中华大地最早接触域外文明,大体上可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的形成。西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大,最后已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如今我们所谓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皆包含其中。今日汉语中许多词汇,不少来自佛教经典。

魏晋时期是西域文明传入中华的鼎盛时期。北魏晚期洛阳城内,“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下之区矣。”唐代胡商大率麇集于广州。从广州通向中原,至江苏后则集于扬州,因此扬州为胡商集中之地。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长安。大批西域人寓居长安,遂多娶妻生子,数代而后,华化愈盛,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矣。长安成为一国际性都会,西域的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等传入中华,长安汉人胡服、胡食者不少,西域文明皆溶入中华文明之中。日本僧园仁于唐开成三年(838年)来华,从长江口入境至扬州,只见“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舡,小船等不可胜计。”都是等待从扬州北运。此后,园仁从扬州走江淮运河,经高邮、宝应至楚州,从楚州出淮走海路,经海州至登州上岸,经河北至五台山



日本僧园仁

礼拜。又经山西至长安。大中元年(847年)返回,就从长安经潼关,又经郑州走汴河至楚州出海,最后经新罗回国。历时九年七个月。途经当时唐朝的

主要运河汴河和江淮运河,对沿途唐代城乡地方行政制度,国内交通状况路线和设施,都有明显记载,这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元明清时代的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宛如一串连线的珍珠,光彩夺目。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外来文明进入中国后,往往通过运河,转入全国各地。十三世纪下半叶,正当中国元朝时,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华,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中国各大城市,当他到达了今天的北京城当时的大都时,惊叹这个城市人口的众多和繁荣,“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个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指中国)各省和帝国其它各省,凡有贵重值钱的东西都运到这里,供应那些被这个国家吸引,而在朝廷附近居住的大批群众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他可能没到过当时大都城内的积水潭(今什刹海),那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不知道这些主要商品是从运河运来的。以后他沿着京杭大运河南下,经过了临清城,看到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它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方便。”到了东平州,“有一条深水大河流过城南,”“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再南下,到了淮安,更是惊叹“过境的船舶舟楫,穿梭般地川流不息。淮安府是大批商品的集散地,通过大河将货物运销各地。”以后一路上经过扬州、镇江、常州,惊叹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富有。到了苏州,更盛赞其“漂亮得惊人”,“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行销其他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成为富商大贾。这里人口从多,稠密得令人吃惊。”下一站杭州,“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

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所以有‘天城’之名。”对杭州城描述非常详细,美丽的西湖,宽大的运河,捷便的水运交通,使市场上的充斥了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香料、珠宝、胡椒和葡萄酒,人们富有而奢靡。他对杭州城市的景色和各种风土人情均有详细的记述,对杭州这座城市赞不绝口。他的记述让中国的大运河和沿线城市区的繁华信息传到了欧洲,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今天也是可从他的记载,领略到十三世纪苏州、杭州城的繁华。



马可·波罗

16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华住了28年(1582—1610年),最后死在北京。他将在华传教的经历记录下来,后世称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他将在华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其中就提到大运河:“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城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同时对运河运行

也有具体的描述,“从一个闸到另一个闸,对水手是个艰巨的任务,““由于运河中很少有足够的风力,行船更增加了负担,于是从岸上用绳纤拉船前进。”他看到“从南京到北京沿途南京省、山东省和北京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它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所以人们说北京什么也生产,但什么也只不过不缺。”此书以后传到罗马,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中华文明的西传产生巨大影响。



利玛窦

明清时代西方传教士、日本、朝鲜官方、民间人士来华都经过大运河。对中外文明的相互了解、相互影响,都产生过重大作用。这些前人有很多专论研究,在此不赘。

叁

中华文明内容十分丰富,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还可以有制度文明等等。关于制度文明,在我们中华是十分成熟的。这里非本主题不必详谈。这里主要讲与运河有关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从秦汉以降,漕运成为国策,运河成为国家级工程。每年从南方诸省大批物资要通过运河定时、定量运至首都(唐代为长安、洛阳,宋代为开封,元明清为北京)。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且不论运河的自然条件不十分理想:运河所经水源不一、地貌不一、气候不一、水流深浅不一的地区。还有沿运官府乘机敲榨、勒索,百般刁难。为保证最终达到目的,历代王朝制订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每一个沿运的县、乡的运河管理制度。层次明确,职责分明。这一路数千里,途经数

十闸,运舟数千艘,运粮数百万石的巨大工程。外国传教士亲历者也感到十分吃惊。“这是他们成功之处。但这也并非毫不费力,不耗费巨所能做到的。”在运河的管理上,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和毅力。

从唐宋以降,历代外国使者、商人、传教士、学者来华大多经过运河。他们不仅将该国的物质文明(科技)和精神文明(宗教)传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华文明信息传入世界各地,无疑是丰富和加强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以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

中国大运河能成为世界遗产,反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大运河对世界文明贡献的承认,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来源:运河网 2018年5月3日)



砥砺前行履治水之责

——基层河长谈治水感悟

□方晓晶

水安则人安,水美则景美。回首过去4年的时间,我见证了一条河道从“黑臭差”到“绿清美”的华丽蝶变。勤丰港——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综合治水示范区”11条河道之一,全长3057米,其中北段临丁路至上塘河937米,南段临丁路至一号港2120米,宽10—15米,水域面积66349平方米,水位3.4米。在浙江省全面推进“五水共治”工作的大背景下,2014年我被正式任命为勤丰港社区河长。

作为一名区级党代表,我高度认同“五水共治”就是抓深化改革惠民生的工作。治水是新形势下我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生态文明建设的诉求、政治文明建设的追求。

身体力行,做“五水共治”的践行者。担任社区河长后,治水便是我日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记得河长公示牌正式落地那天,我细心地把它擦拭了一遍,又从河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感觉走了很久,如此陌生却又那么亲切。为了不辜负一个崭新身份的开启,坚定执着成为我治水的态度,风雨无阻成为我治水的坚持,汗流浹背成为我治水的常态。

积极倡导,做“五水共治”的宣传者。“五水共治”优化环境、普惠民生,这是我向居民传递的重要理念。作为“治水”工作的护航员,充分利用自己所在社区的公共资源,通过宣传栏、短信、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屏等媒介载体加大宣传力度,同时



结合江干区“周三访谈夜”和“百千万”大走访等活动来解读治水政策并从中收集一些民间治水的好办法。借助群团的力量发动并落实“五水共治”的相关政策,也为“治水”工作的顺利推进做好充分准备。

出谋划策,做“五水共治”的建言者。“治水治人心,治水治岸上”,这是我的治水观念。对勤丰港早期的河道治理方案,我反复看了不下10遍。新时期的治水局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问题可能不只是河道本身,更有来自两岸居民生活带来的隐患。它需要我们对治水工作有一个全面评估,也需要有新的治水视角、治水方案。在后来的治水实践中,我逐渐证实了当初的想法。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高度认同“五水共治”就是深入民情解民忧的工作。治水是新形势下我省基层管理的新任务、服务群众的新目标、化解民忧的新焦点、美好生活的希望。

谦虚谨慎,做治水的学习者。对一个没有水利行业背景的人而言,治水工作具有极大的挑战和难度。鉴于此,从专业理论到实践操作,摸索学习,逐渐展开工作。勤丰港的前身是用于农田灌溉的小沟渠,2009年河道拓宽,沿线开始建造11个小区,主要集中为保障性用房,由此导致大量泥土流入河道。全省“五水共治”攻坚战打响后,区区3公里的河道清淤竟达2万8千方,透明度、溶解氧、氨氮、总磷等严重超标,勤丰港也被列入江干区黑臭河“摘帽”对象。但从河道清淤到截污纳管、种植水生植物再到投放鱼苗生态养护,仅8个月就完成了黑臭河“摘帽”任务。

深入问题,做治水的探索者。在治水工作开始前,有居民向我反映勤丰港的河水很臭,臭到无法打开窗户。带着民忧也带着疑问,在河道清淤过程中,每天都会去现场查看。有一次下到河床发现那淤泥堆得比我还高,至少有2米5。特别地,在沿线发现了21根粗细不同的管子,有的会流出白色泡沫的洗衣水,有的会流出黄色的生活污水。经过一个多月的细心观察,推断这些管子来自沿线的小区居民住宅楼里。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之后,认为问题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开发商建楼时将污水管道直通沿线河道;第二,河岸沿线近2万户的居民不同程度的将洗衣水从阳台直接排进雨水管道从而流入河道;第三,沿线商铺乱接管道,如将厕所的污水管道就近接入门前的雨水管道。可见,勤丰港水体中氨氮和总磷超标,与沿线住宅小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正是河道污染的根源和治理的难点。

实际调研,做治水的研究者。针对上述问题,发现河道治理存在三个难点:第一,寻找开发商责成管道整改难度较大,特别是有些住宅小区因过了8年质保期而难以认定责任主体;第二,管道工程改造所需经费的来源无法确定;第三,属地政府财政被迫承担由上一级政府投入建设所引起并遗

留的河道治理责任。为此,我产生了一些想法:一是在对沿线建楼进行验收时,属地政府应主动参与,以避免管道乱接,污染河道;二是要大力推广“阳台水治理结合初期雨水治理截污纳管”项目,该项目于2014年8月在丁桥兰苑小区进行试点,即人工打造一个阶梯式生态湿地,在附近一号港北侧100多米的绿化带建造雨水沉淀池、调蓄池和三层阶梯式生态湿地,每一层种植不同的植物,流进来的阳台洗衣水、初期雨水经处理后变为可直接排入河道的V类水;三是对导致河道污染的居民个人行为,如沿线商铺乱接管道等,应通过工商和城管联合执法给予经济处罚并责令整改。

作为一名社区河长,我高度认同“五水共治”就是引导全民共同参与的工作。治水是新形势下我省“政府治水”向“全民治水”的转型、“思想知晓”向“行动参与”的转变、“独立治水”向“协同治水”的转移、“共享共治”向“共得其利”的转化。

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河长固定日活动。以每个月第一个周一为固定日,开展5+x河长巡查河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团队活动。勤丰港河水经水质净化、生态养护后,已于2016年初达到V类标准,因而钓鱼的人开始多起来。这虽是好事但却破坏了绿化。为此,丁兰街道在勤丰港设立了19个亲水平台和14个垂钓点,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在河长工作中,曾注意到勤丰港南面的河水颜色偏深的情况,在深入调查后发现勤丰港与一号港的河水是联通的,而一号港又与其他区的河水是联通的,其他区的污水流入一号港进而污染了勤丰港。对此,以江干区治水办为牵头单位,丁兰街道协助开展了跨区“五水共治”的协调工作,使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2016年勤丰港河长团队荣获江干区“优秀河长团队”的称号。

以党群引领为牵头,开展守护身边河道活动。作为社区河长又是一名党员,更有义务去组织护河活动。由社区党员、居民骨干、志愿者和民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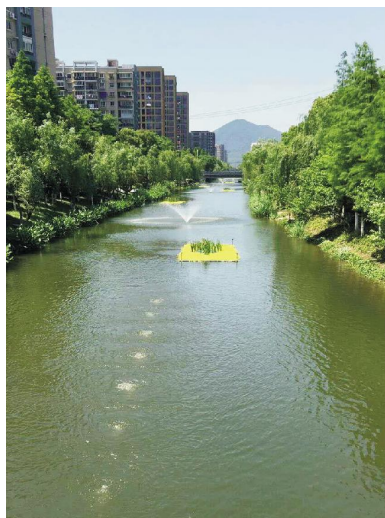
长组成一支 14 人的“勤丰港护河队”，2 人 1 组，1 日 3 次对河道进行巡查，内容涉及河水颜色是否变黑，是否有人往河里偷倒污染物，是否有晴天出水现象，是否有人电网捕鱼，是否有人在河道洗衣服，以及其他非常情况。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通过传递现场照片或视频来说明最新情况。14 位护河队员中有退休的社区副书记、社区的党支部书记、业委会成员、文体队长、居民代表等，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骄阳烈日，他们都能尽心尽责地做好每天的巡查工作。

以群团协作为载体，搭建“五水共治”活动平台。通过走访辖区商铺，发放“五水共治”宣传资

料，年发放量达 1000 余份；与业委会一起对商铺管道进行集中排查；与团委合作面向小区内的青少年开展“增殖放流生态治水”——小甲鱼公益治水活动；与辖区学校“暑期争章”活动相结合，开展以“五水共治”为主题的绘画、写作活动，并组织学生参与巡查勤丰港，等等。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水始终在路上，砥砺奋进履治水之责，改革创新担兴水之任。

（作者：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蕙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打好组合拳 全面深化河长制

——以衢江区廿里镇为例

□徐雨玫

近年来,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接连打出“建制先行、网格融合、全民动员”三记组合拳,有效促进治水工作规范化、河长履职成效化、水体管护常态化,全镇区级河长1名、乡镇级河长3名、村级河长16名,塘长238名,渠长67名,全面消除27个劣V类水体,镇域内3条河道及支流和101个小微水体全部纳入日常监管,确保一江清水送下游。

一、建制先行,压实河长责任。一是健全河长架构。成立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对辖区内主要河流分级分段设立河长,建立纵到底横到边的河长制组织体系。3条主干河流由党政领导任河长,各支流由所在村支部书记任村级河长,同时设立协管人员,构建“党政齐抓、上下共管”格局。二是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一周例会、日查夜巡、绩效问责等河长制工作机制,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中的重难点问题,定期通报河湖管理情况,督促各相关单位和村按照职责分工,落实责

任,协调联动,共同推进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确保河长制不摆样子、不走过场。实施以来,约谈河长13人次,整改问题18个,河长巡河率、问题整改率均达到100%。三是推行智慧河长。全面推广“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河长制APP),实现全流域覆盖。充分发挥河长制APP网络实时上传优势,及时做好河长信息更新,强化三级河长巡查责任落实。通过定期通报及将通报结果纳入年终考核,让河长制APP成为河长责任落实的“比武场”,力争各级河长“真巡、实查”,大小问题“狠抓、速改”。

二、网格融合,不留治水死角。一是超前规划,技术“保驾”。将治水纳入全科网格信息化平台,整合现有资源,高标准制定未来三年全科治水规划。计划实现交界断面、排污口、重点区域实时监控全覆盖,引入水质监测系统,动态监测辖区内水质,信息统一纳入“四个平台”,降低治水成本,提高治

水效率。二是多效合一,网格助力。在织密基层河长网络、织好河道保洁员网络的基础上,专职网格员积极发挥“移动探头”作用,聚焦本网格内重点河道、沟渠,对问题曝光点进行重点“监视”,每周巡查5天以上,每次巡查时间不少于2小时,依托浙江省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平安通手持终端和平安浙江APP,根据问题严重性,按照整改难易程度分层级选择汇报、讨论或当场整改等方式解决问题,及时将发现的问题拍照、上传。截止目前,累计上报各类治水问题403个,现场整改305个,曝光问题次日解决率在95%以上。三是部门联动,平台整合。梳理各网格员上报治水情况,对网格员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利用现有四个平台信息系统第一时间整合力量流转办理。截止目前,排查无证作坊、企业偷排漏排等重点问题11起,通过四个平台,调动市场监管、派出所等综合执法19次,共计57人次。

三、全民动员,深化长效管理。一是试行党员“认购”。结合农村基层“双整”工作,探索“党建+治水”模式,在黄山村试点党员“认购”法,由一名党员认领一条沟渠、水塘或河流,实行责任区块党员日常保洁制。通过一月一沟通、一季度一考核,

调动党员积极性,发挥包干效益最大化。二是开展志愿服务。组建“共青团+少先队+青年志愿服务队”的治水志愿服务体系,开展“小红帽”巡河护河系列行动,利用学雷锋日、植树节、世界水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围绕垃圾清理、文明劝导、环境美化等主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累计组织护水行动17次、参与387人次。三是强化人大监督。镇人大代表每周不少于2次对三级河长履职情况进行定期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拍照上传并交办河长,监督河长履职。同时对问题查摆不力、整改懈怠的“河长”,由人大进行履职约谈,并将河长履职情况列入人代会议程,接受代表质询。截止目前,镇人大共发现问题23个,约谈河长4名。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两山”理论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是实现我省“两个高水平”和“大花园”战略的内在要求,更是纵深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暨“五治”的重要抓手。下一步,廿里镇将继续完善举措,进一步深化河长制,提高群众参与度,提升群众满意度,共治共享美丽家园,携手共创美丽中国。

(作者:衢州市衢江区治水办通讯员)



江山港廿里段



江山港航拍图



江山港廿里段航拍



江山港生态防洪堤

金华被批准为 全国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

今年年初,我省金华市和北京市房山区、山东省威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等4个城市被正式批准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日前,金华市正式启动了这项创新试点工作建设!



开展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工作是加快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水资源节约利用、贯彻国家节水行动的重要实践。为做好全社会节水工作,2016年12月,科技部和水利部决定在全国组织开展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工作,重点突破区域水资源综合配置、行业节水、废水资源化循环利用、海水淡化等技术体制瓶颈,形成适宜不同地区的综合节水发展模式。2017年,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在全国启动。

为什么是金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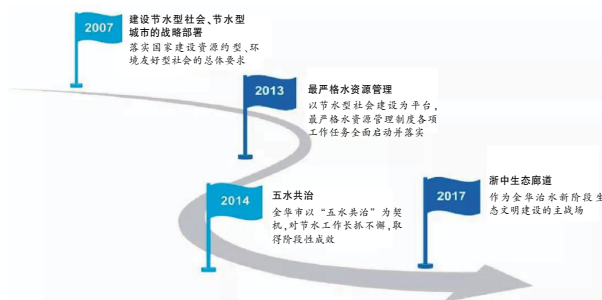
金华是水利“大市”,水库山塘量多面广,但也是水资源“小市”,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513毫米,时空分布不均,时段性、区域性缺水特征明显,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660m³,低于全国(2200m³)、全省(1760m³)平均水平。

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

当前,金华全市正围绕“全面小康、浙中崛起”目标和“走在前列、共建金华”要求,扎实推进综合交通、金义科创、浙中生态“三条廊道”建设,加快现代化都市区建设,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凸显。

近年来,金华以“五水共治”为契机,大力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用水需求和过程管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全市用水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金华市节水工作主要历程



金华市区获评“国家节水型城市”，城镇生活用水指标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义乌市是全国第二批节水型试点地区，被授予“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称号，永康市是全国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两个县级试点之一……这些成为建设全国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的重要基础。

但在节水工作推进过程中，手段不多、创新不强，生产、生活、消费各环节仍有节水“短板”，需攻坚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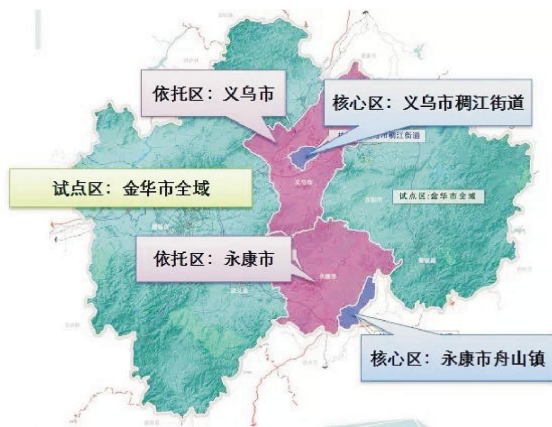


如何建设创新试点？

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用水方式，金华市确定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实施期限为2018年至2020年，紧抓生活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这一重点，将义乌市、永康市作为试点核心区，分别开展“水源保护——全程节水——排水治理——再生回用”和“农村饮用水净化——农村生活节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回用——农业精准灌溉”全过程技术集成应用和制度完善创新，打造义乌市稠

江街道城市综合节水集成、永康市舟山镇农村综合节水集成等2个示范项目。

同时，健全体机制类、管理制度类、市场机制类和政策创新类4类节水管理制度，不断扩大工业、生活和城镇公共、农业三类节水减排工程建设的覆盖面，实施推广非常规水利用工程，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打造包括节水型灌区、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单位(含宾馆酒店)、节水型小区和节水宣传教育基地在内的5类节水载体，全力以赴推进试点建设。



金华的目标

争取“一年有亮点、两年见成效、三年出经验”，把金华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节水示范区，为全省和全国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多金华经验、金华元素。

(来源：微信“浙江水利”2018年5月14日)

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辛识平

四月江浙,满眼葱茏。余姚横坎头村的樱桃熟了,村里的农家乐挤满采摘的客人,停车成为“甜蜜的烦恼”;盛产毛竹的天目山周边,家家户户忙着晾晒笋干、采摘新茶。穿行在一个个“开门见山,推窗闻青”的浙江村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老百姓纯朴而温暖的笑脸。在他们眼里,绿水青山带来了好日子,“诗与远方”不在远处,就在自家门口。

“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在浙江乡村,干部群众会不约而同地提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八八战略”,津津乐道 15 年前开启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人们真切感受到,正是从那时起,村子一天天变美,生活一天天变好。回想起来,不无感慨,更不无启示。

发展经济就一定要牺牲环境吗?曾几何时,这样的问题萦绕在很多人心头。不是没有走过弯路、付出过代价。从浙江安吉县刘家塘村一眼望去,山上至今仍留有炸山开矿的痕迹,十余年前的“大炮一响”,虽能换得“黄金万两”,却造成“晴天一层灰、雨天一层泥”的生态恶果。2005 年 8 月,习近平来到安吉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村民们关闭矿场,利用大片毛竹林做起度假景区,实现了从“挖矿人”到“护绿人”的身份转变,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刘家塘村的变迁,是浙江乡村万千个美丽故事中的一个。它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留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

乡村之所以美,既在于景,更在于人。让农民的生活更加体面、更加文明,何尝不是一道动人的风景?以垃圾分类为例,“会烂”与“不会烂”,这一简单而接地气的二分法在浙江乡村被广泛推广,厨余垃圾送进阳光房堆肥,金属纸板等资源分拣回收,电池等有害垃圾可以拿到村里的“垃圾超市”兑换肥皂、纸巾,“垃圾不落地”正在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打开窗门,聆听穿村而过、不舍昼夜的溪水声;愿意把自家的鲜花放上窗台,摆出小院,与村里的环境融为一体。农民的窗台,时代的明镜。一个个细节,体现着百姓对家园和生活的热爱,折射出农民生活从“将就”到“讲究”的深刻变迁。

乡村的大美,美在心灵滋养、文化传承。在浙江乡村,“白天劳动挑一挑,晚上礼堂跳一跳”日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流传千百年的家训,让邻里打开心结、化解矛盾;即使没有奖金,各家也要争当“五星”文明家庭……让农民在“身有所栖”的同时“心有所寄”,日益成为和谐的纽带、文明的内在动力。

种一片绿色,润一方乡土。15 年美丽接力,人改变了环境,环境又塑造了人。“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竹子生长拔节的声音,如同我们的生活,节节拔高”。诚如安吉一位乡干部所说,美丽中国生长的声音,就是亿万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共同心声。

(来源:新华网 2018 年 4 月 25 日)



浙江丽水： 打造瓯江国家河川公园 建幸福大花园

□记者罗雪斌 通讯员汪小阳 蔡麒麟

浙江丽水的优势在于生态,在于山水。八百里瓯江,群山簇拥,仿佛人间仙境,处处是景,处处是宝藏。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这里先知先觉的人仿佛看到了打开聚宝盆的金钥匙,也等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丽水来说尤为如此。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丽水成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与试验田,也成了世人瞩目的聚焦地。

浙江省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谋划实施“大花园”建设行动的重大部署。这是浙江省全面落实“八八战略”和深入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举措。对于丽水的发展,要按照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提出的打好“五张牌”的要求,全力创建“大花园”,积极培育新引擎,率先把丽水打造成为浙江生态经济的新引擎、“诗画浙江”的鲜活样版、世界一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努力在实现“两个高水平”新征程中展现绿色担当,留下鲜活丽水印记。

丽水市委书记张兵对丽水发展给予了新的期望,他说:“争先进位大赶超,实现丽水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开辟‘两山’新境界。”

如何让丽水更好的、更快的发展?丽水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用最实干、最创新的方法,实现丽水弯道超车,实现新的质的发展。

瓯江是浙江省的第二大江,干流全长 384km,流域面积 18100km²。瓯江水系为丽水市的主干水系,市域内干流长 309.4km,流域面积为 13105km²,占



流域总面积 75.86%。瓯江是丽水的母亲河,她见证了丽水发展的时间轴,演绎了城市发展的空间轴,承载了丽水发展的精神轴。

散落的众多山水资源因散而成不了气候,成不了转化财富的条件。这愁苦了沿江的群众。瓯江把散落的资源串珠成链,瓯江就成了大花园建设的基底。为了开发瓯江,丽水市委、市政府委托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了《瓯江国家河川公园》即丽水大花园建设策划。



张兵书记在调研水利项目时,他说,一定要考虑景观工程,要依据景观河道、旅游河道来管理。任何建筑和工程都要用旅游的眼光来审视,要赏心悦目,一步一景。因此,大花园建设水利的总体理念以瓯江为立足点做好水文章。以“国家公园+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美丽河湖”为空间形态,加强顶层设计,规划瓯江国家河川公园,打好统筹全域水利牌,助力丽水大花园建设,支撑丽水绿色发展,科学赶超。

瓯江河川国家公园目标:“一江丝路盛景,十城秀美河川,百里滨水画卷,千村碧水映绕”。初步策划投资近 700 亿元,实施水库工程、河道治理、滨水绿道、引调水、水生态保护和修复等 5 大类 40 多项重点项目。

一江丝路盛景。一江指瓯江。通过瓯江干流青田水利枢纽等梯级水库建设,梯级水库库库相连,极大改善航运条件。同时建设浙西南大中型水库群,建立梯级枢纽生态航运调度制度,提升和保障瓯江干流航运能力,从而打通丽水的出海口,响应

在国家‘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开启对接海洋经济的新时代。通过瓯江治理二期、龙泉溪治理二期工程等河道整治,建立瓯江绿色发展走廊,追根溯源重塑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沿江绿色产业带,着力打造龙泉金村-小梅-云和赤石-莲都大港头-碧湖-白岩-青田腊口-温溪等重要节点。

十城秀美河川。“十城”指丽水市所辖七县一市一区和丽水经济开发区。以行政区域为实施单元,全域统筹,十城联动。各城按照瓯江国家河川公园总体规划,立足当地特色,以美丽河湖为目标,治水造景相融,开展流域综合治理(百河综治),建成不少于 10 条特色河道,联通支流和干流,以线带面,带动沿江全域发展。

百里滨水画卷。“百里”指百里瓯江主干流。

千村碧水映绕。“千村”指一千个乡村。按照乡村振兴水利建设目标,围绕现代农业、乡村生态旅游等对农村水利的要求,重点开展农田水利工程、农村饮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水利风景区创建、水文化挖掘等,实现千村碧水映绕,并串点成链,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据了解,河川公园建设在我国还属首创。该策划从项目背景、花园解读、总体定位、实施策略四大块进行详细的解读及给出实施意见。



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东对于瓯江河川公园建设大为赞同。

精心打造百里瓯江画卷， 实现水旅立体融合

丽水市大溪治理提升改造工程是丽水一江两城的中心轴，是描绘百里滨水画卷的载体。该项目已列入浙江省“百项千亿”防洪排涝重点工程，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23 亿元，范围为瓯江干流上游段起于玉溪电站大坝，下游止于开潭电站大坝，红线控制范围总面积约 2738 公顷，两岸规划面积约 980 公顷，水域范围面积约 1758 公顷，两岸环线周长约 110 公里。目前该项目处于编制阶段，计划今年开工。其中好溪应急段已于去年开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组成主体工程。

项目背景：大溪沿线风光旖旎、人文荟萃，石滩、枫杨林、村舍、古渡口等自然人文要素共同构成了大溪秀丽的山水人文画卷。《丽水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丽水大溪为城市中闲区块，这既是瓯江——南明湖文化生态轴，也是城市发展的空间轴。

根据调研分析，大溪存在如下问题需要治理和提升改造：一是规划范围内主城区段河道基本形成防洪圈，中上游局部区域的水利建设相对滞后；二是大溪两岸有农村生活污染源、工业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对大溪水质有一定影响，采砂导致局部河道滩地生态破坏严重；三是中上游滨水空间，人为侵占较为严重，影响了滨水廊道的构建，两岸自然、人文资源众多，缺乏利用与保护；四是古堰画乡、九龙湿地、南明湖水利风景区等旅游区发展不平衡，与周边区域的联动性较弱。

基于大溪存在的问题和需求导向，《丽水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丽水大溪为城市中闲区块，为了打通古堰画乡与南明湖水陆休闲通道，串联 10 多个重要旅游景区和旅游开发板块（古堰画乡、九龙湖湿地、石牛温泉小镇、港口生态村、四都小镇、万象山公园、冒险岛、南明湖、南明山、古城

岛、厦河塔），推动中闲区域发展，拉伸城市发展空间轴，提出丽水大溪治理提升改造工程。

20 年前，丽水城市防洪工程推动了江滨区块发展，10 年前，丽水市内河整治，推动了城东两湖区块的发展。有理由相信，大溪提升改造工程的建成，将推动大溪两岸区域的发展。

项目的构思和组成：以水为核心，完善城市防洪安全基础设施，构建水环境、水生态保护和修复生态格局。



保障水安全。通过新建、改造、提升、美化沿线堤防设施，满足城区 50 年一遇，其他段 2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同时保留利用河堤、石滩、滩林等资源，利用干砌卵石、松木桩、草坡入水等天然材料，体现生态理念。

保护水生态。通过截污控源、河道水生态修复、河道原位水质净化、河岸防护绿地、水生态修复等手段实现零污染、零破坏，保护现有水生态环境形成“大花园”全国标杆。以绿道为纽带，串联两岸优美的滨水景观空间，传承历史文化印记。

串联水景观。打造车行、骑行、跑步、步行、舟行等五行联景立体交通，规划绿道主线长约 110 公里，支线长约 24 公里。沿线绿道将无缝对接城市绿道网体系，利用防洪堤顶，乡村、田埂道路和新建水上栈道等形式，串联起沿岸的景观资源节点。结合绿道导则布置不同等级的驿站设施，设计从“秀山丽水”出发，结合自然的自然元素，将建筑融于环境之中。水陆交通体系的转换，通过对 20



余处古渡口的改造与提升来实现，同时成为重要的水文化节点。

融合水文化。深入挖掘 800 里瓯江水文化，实践水工程与水文化融合，培育特色生态水文化。2017 年率先在全国开展水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完成 1300 处涉水古迹的普查，努力发掘一批“留住乡愁印记、历史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乡愁景观，串联处州古韵、黄金水道、非遗文化、民俗节庆、画乡风情、自然风貌、名优名产等七大风情，形成一段一品的风貌特色。

以共享为目标， 对接全域休闲旅游体系

做好水旅游。打造以瓯江生态资源为载体，集生态养生、文化创意、乡村旅游、运动健身为一体的瓯江生态文化旅游景区。结合大溪自身特性，形成四大分区，八大主题的水旅融合规划构思，从上游至下游布局古今民艺、田园漫活、碧水联都和山水乐游四大板块。通过绿道串联多个景点，对接周边旅游景区和开发板块，创建水利风景区，规划

丰富的旅游路线，打造丽水具有独特魅力的旅游名片。

以发展为宗旨， 促进流域绿色产业的全面发展

发展水产业。瓯江文化为轴，生态基质为底，从“特”、“美”、“养”三大层面筑起“最休闲、最好玩、最丽水、最瓯江”的水旅游产业链条。依托山水乡愁景观，立足周边产业基础，重点发展文化、养老服务、旅游服务等产业，发展“丽水香鱼”产业，实现香鱼随人、水清鱼跃的景象，全市流域 5 平方公里以上河道景观鱼全覆盖。本项目拟投入 23 亿，通过 GOD 开发模式，推进滨水空间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引入 200 亿的相关产业建设，最终形成超 500 亿的资产投资。

以惠民为根本， 提高周边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

实践水样板。以“瓯江画廊、丝路印象”为规划理念，勾勒出百里立体画卷，以创建多彩瓯江国家

河川公园为目标,全面完成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周边居住环境、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成功建设申报国家 5A 级景区,沟通连线周边县市景区,发展一系列特色产业,带动周边百姓经济创收,成为“两山”践行的全国标杆和“诗画浙江大花园”的鲜活样板。因此,高规格的规划就显得极为重要,规划按照,一张蓝图到底(瓯江河川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并在此基础上配套多项专项规划),五大策略(分析流域水系情况,综合构建水安全格局;保护河川本底,维护河流原始生态风貌;整合河川文化资源,打造系统性人文脉络;串联流域核心资源,形成完整浏览网络;完善和分区管理体系,保障其可持续发展),三大分区(生态保护区、自然保育区、游憩开发区)。

区域统筹:全程统筹,一个中心,八城联动。建设保障:六大保障,统筹并进。全域作战,有效衔接;组织保障,质量保证;系统调控,减少链条;统

一蓝图,专业团队;目标控制,确保效果;科学管理,智慧运营。

丽水市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徐为民介绍说,“瓯江国家河川公园打造开全国先河,保护好了、发展好了,就能百倍、千倍的回报,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民心工程。我们一定要高起点、高标准,尽一切办法建好这个前无古人的生态河川公园。”

按照瓯江国家河川公园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的打造,一幅山水相融的生态美景将挂在浙江的版图上,成为一块受世人瞩目的生态宝地。她的建成将成为丽水争先进位,实现弯道超车的制胜法宝,也将为丽水开辟“两山”新境界抒写新的篇章!

(作者 1:丽水市水利局规划处处长 作者 2:《丽水日报》记者 来源:人民网 2018 年 5 月 14 日)



皇家阿德瑞娜山庄水景观池,由专门修建的人工水渠供水

西方早期水文明的 构建及其影响

□郑晓云

水不仅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自然物质,同时也是构建人类文明的重要物质,对水的认知、控制和利用,不仅驱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对塑造人类历史的面貌也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的早期世界中,水作为一种构建文明、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传承穿越,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希腊文明是公认的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对水的认知和应用对于希腊文明的构建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水的社会属性而言,我们可以将其

分为对水的属性的认知和水的利用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是在思想层面上对水的思考,后一个方面是技术的探究和实践。技术的探究与实践显然要早于对水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思考。人类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少不了和水的互动,在技术层面上利用、管理水,让水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在希腊文明起源最早的克里特岛上,考古发掘发现了至今 5000 年左右的科罗索斯王宫遗址,在这个王宫遗址中发现了人类最早的城市供水系统,包括从引水渠到城市供水的分水管网、储存水、污水与雨水排水设施。这其中最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是在超过 1300 个房间内发现了浴室



4000年前希腊克里特岛上的蓄水池内景-安吉拉克斯先生提供

和水冲厕所，这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水卫生设施。这些设施是西方城市水利可以追索的最早的源头。在随后的岁月中，引水渠、水井、收集利用雨水的蓄水池、作为城市供水末端设置的喷泉以及纪念性的喷泉、浴室和冲水厕所等卫生设施，都成了希腊文明的重要内容。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希腊的贤哲们对水的非物质属性的思考，在西方世界中对水的思考第一次被纳入到哲学范畴中。希腊早期的思想家包括泰勒斯(公元前624-546年)、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都对水的物质属性、在生命中的作用、水的构成、地球的水循环、江河湖泊的起源等自然属性做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诸多的假设和理论，同时广泛思考了水和人类文明的关系。他们的思考主要是基于尼罗河的特征及其与埃及文明的关系上，这些思想家都表现出了对尼罗河强烈的好奇心，思考尼罗河泛滥和埃及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及尼罗河的来源、泛滥的原因等等。他们认为，尼罗河和其他的河流都不一样，是和世界同时产生的，是一条救世的河流、一条具有生殖能力，让万物具备再生能力的河流。它培育文明，同时又不像其它河流一样具有破坏力。他们认识到了尼罗河泛滥和埃及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

直接的关系，但是并不能解释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形成。因此他们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神的力量，从埃及神话中寻找解释，同时也借用埃及的神话来构建希腊的精神世界，使埃及的文化融入到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众所周知的是，神话对于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围绕着尼罗河在希腊产生了大量的神话和文学作品，希腊人甚至信仰来自于古代埃及的河神，很多和尼罗河相关的文化现象一直传播到了后世的西方世界中。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古代希腊的思想家们对尼罗河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并且进而影响到希腊古代文明的构建呢？在公元前十世纪，甚至更早，埃及尼罗河流域已经通过贸易成为希腊和随后的罗马等地中海国家的粮食供应地。在地中海北岸地区并不生产小麦，它们吃的面包的原粮小麦及其它粮食主要通过贸易从埃及获得，而埃及由于尼罗河的泛滥带来的农业丰产满足了这一切要求。在强大的海上贸易支撑下，这种格局得以形成。埃及不仅能产出丰盈的粮食，更有高级的文明存在，因此对尼罗河现象的神迷、埃及的高度文明、现实生活中对埃及的粮食依赖，都足以让希腊的贤哲们对埃及产生敬仰与思索的兴趣。对于尼罗河自然特性与文明的思考使得埃及文化跨越地中海传播到了希腊社会中，生根成长，成为希腊文明的构建力量。

二

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它不仅拥有广袤的领土，同时也有先进的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然而罗马帝国的强盛同样也和水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往往是我们认识罗马帝国的历史过程中所忽略的。罗马帝国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以领土扩张为特征的帝国，扩张领土并实施有效的治理，包括对领土的拥有和领土的社

会治理是罗马帝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水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首先,罗马帝国领土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城市化,具有罗马统一的城市建设元素,包括罗马剧场、供水设施、喷泉、广场、市政厅等要素的城市,都会在罗马帝国占领的土地上迅速修建。罗马帝国时期修建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城市供水系统,这些城市供水系统伴随着罗马帝国城市在其扩张的领土上的修建而修建,成为城市化的重要基础,配合了罗马帝国通过城市化来巩固领土的治理策略。罗马帝国水利的典型代表是引水渠,尤其是引水渠桥更是被称为罗马帝国的旗帜,只要罗马帝国的土地扩展延伸到哪里,罗马引水渠就修到哪里,并且数量巨大。当年仅在高卢地区就修建了300多条,目前在地跨欧亚非广袤的罗马帝国故土上还有1600多条引水渠的遗存。这些引水渠短的几十公里,长的达500多公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供水和长距离调水,这种奇迹一直到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都没有被超越。它不仅解决了城市供水问题,同时由国家统一谋划、大多由军队建设,更彰显了国家的实力和权力,这是引水渠修建的重要目的。

其次,罗马帝国通过水推行罗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帝国领土上实现其“罗马化”(Romanisation)。在罗马帝国统治历史中,领土上的所谓的“蛮族”冲突和教化问题一直是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水成为罗马帝国实现教化的重要工具,在帝国的领土上的城市扩张过程中,首先被修建起来的是大型的公共浴场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冲水厕所等设施。有的浴场可以容纳数千人同时沐浴,沐浴成为罗马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罗马化的重要标志。从军队到市民的生活,沐浴是日常生活方式,罗马统治者认为沐浴不仅能让军队更有战斗力,也能够领土上的“蛮族”也变得文明起来。因此公共浴场在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城市中

遍地开花。与此同时,喷泉等城市水景观设施也被大量修建,使罗马城市充满水的元素。

罗马帝国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有明确的文化理念支撑,那就是通过水和水利工程建设来达到构筑国家认同、国家权力、国家象征,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目的。第一,通过对水的控制和发挥来显示对罗马帝国以前的文明的超越。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对希腊文明的一种继承和发挥,水利成就同样也是继承了古代希腊的成就,包括引水渠在内的城市供水设施、沐浴和水冲厕所、喷泉等都是希腊人的发明,但是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一切在建设规模和供水量上都被发挥到了极致,以达到对先前的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的超越。在罗马帝国早期,通过一些途径显示对古代埃及文明的超越的意图是十分鲜明的。第二,现实中的罗马帝国,通过宏大的水利工程能创造一种辉煌的、可以和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和希腊的建筑奇迹相媲美的新的人间奇迹,以显示罗马帝国的强盛和力量,是罗马帝国大规模水利建设的文化动力。因此,罗马水利史专家D. 瓦尔特先生指出罗马帝国水利的修建“不在于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态度”。罗马帝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工程规模、技术创新、政治功效、社会影响最大化的一个治水奇迹,因此水利成为罗马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距今约4000年前克里特岛科罗索斯皇宫壁画中手持水罐的侍女

三

希腊早期文明中对水的利用而构建起发达完善的城市水利系统,推动了其文明的进步。希腊古代贤哲对于水的自然物质属性及尼罗河泛滥和埃及文明之间关系的探索,进而触动了对于埃及文化的借鉴和文化重构,打通了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之间的脉络,对于希腊文明来说也是一种较大的提升。影响后世的水文学也是从这里发端的。罗马帝国建立以后,一方面继承了希腊水文明的要素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水利的奇迹,实现了国家的治理,另一方面也籍此显示对先前的文明,包括希腊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超越,达到构建国家认同、显示国家强大的目的。通过对水的控制来实现

上述目的在罗马帝国时期是非常鲜明的,水成为构建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罗马帝国的水利文明也对后世的世界文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括城市大规模调水供水原理、水利技术、沐浴设施、冲水厕所、喷泉等从理念到技术层面上的遗产仍然惠及当代。水成为沟通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帝国文明,以及后世社会的一种重要动力因素。水的文化动力作用也包括在阿拉伯世界、美洲、亚洲等的发展过程中。因此,不了解水在文明传承中的这种动力角色,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脉络。

(作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法国水科学院院士 国际水历史学会前任主席 该文主体内容载于《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罗马郊区的引水渠

良渚古城消失与水库溃坝关系探讨

□周黔生

一、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概况

2016年,经多方专家论证,杭州良渚古城外围近年发现的古代庞大的水利系统被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之一,水利系统具有灌溉、防洪、防潮、航运等作用。良渚古城外围水坝,可与5千年前其他文明古国的水坝相媲美,例如约旦曾发现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块石护坡土坝;在埃及发现了公元前2900年左右的科希斯坝,坝高15米,坝长450米。

2015年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勘探调查,证实了这一水利系统已有4700至5100年的历史。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条大小、高低不等的堤坝组成。从古城北面的塘山长堤的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坝,距离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距离5.5公里,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最远的蜜蜂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足见工程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就达到260万方。建造水坝的材料很独特,称为“草裹泥”,里面淤泥,外面草茎,彼此贴合紧密。水坝下部用草裹淤泥堆筑,整体外面盖上黄土。

这些水坝分布在两个区域:上坝(高坝)区和下坝(低坝)区。上坝区主要建在山谷溪流出口处,拦截山谷里的水,海拔高30米至40米,坝体相对高度10米至20米,如岗公岭坝、秋坞坝、石坞坝、

老虎岭坝等。这些水坝长的有300米,短的只有几十米,坝体底部厚度近100米。现今,在塘山长堤北部溪流上建有康门水库,集水面积为5.4平方公里,总库容133万立方米,坝型为黄泥心墙土坝,坝高17米,坝顶长165米,坝顶高程50米,灌溉面积3000亩。在白鹤溪上建有奇坑水库,水库集水面积3.5平方公里,总库容114万立方米,坝高25米,坝顶长108米,坝型为土石混合坝,坝顶高程33米,灌溉面积1308亩。由于古代上坝区的几座小水库的坝高都小于康门水库和奇坑水库,蓄水量自然也小得多,估计最大库容约数十万立方米,多数为库容在十万立方米以下的山塘。

下坝区水库建在小河三角洲平原地带,几个坝体把河谷下方的孤丘连接起来,形成宽阔的湖泊沼泽地带,面积约10平方公里,由于水面面积较大,雨季蓄水量可能超过1千万立方米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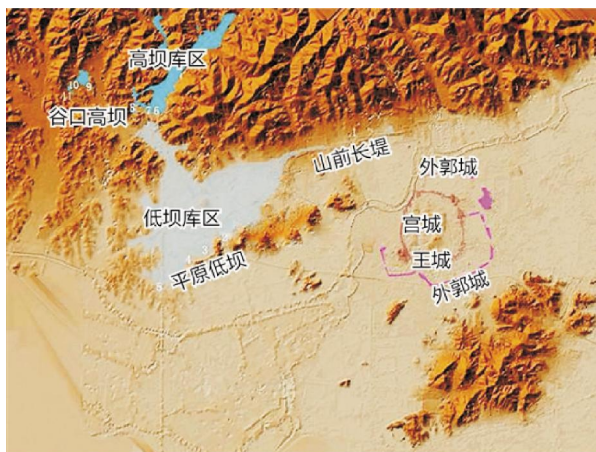


图1 杭州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结构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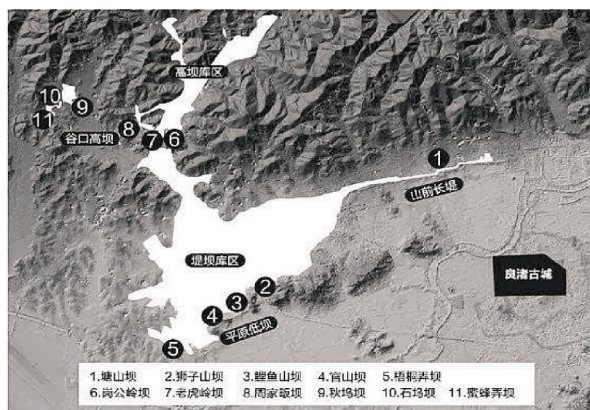


图2 良渚古城水坝分布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水库溃坝及原因分析

大洪水期间,由于水库上游洪水量超出水库库容,容纳不下,或水库质量不好,就会发生溃坝事故,而且不论大、中、小型水库都有可能发生溃坝事故。

据我国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2008年普查资料统计,1954—2007年,我国有3503座水库大坝发生溃决,且溃决大坝中98%以上是土石坝,年平均溃坝率接近万分之八。按库容统计,小型水库(库容10—1000万立方米)溃坝数占总溃坝数的96%。

从溃坝原因分析,库水漫顶是水库大坝溃决的最主要原因,它占溃坝总数的比例超过51%,渗透和结构失稳导致的大坝溃决占溃坝总数的比例接近39%。漫顶破坏时,土石坝的初始溃口位置一般在坝顶中部或者填筑质量存在缺陷的部位。坝基渗透破坏时,初始溃口位置一般出现在大坝下游坝址处。土石坝的最终溃口形状一般为上宽下窄的倒梯形。以下是国内溃坝实例:

1975年8月上旬河南省发生特大暴雨,暴雨中心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创历史记录,暴雨洪水超出两座大型水库(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调蓄能力,相继发生溃坝。板桥水库8月

8日1时水位涨至最高水位117.94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3米时,大坝在主河槽段溃决,6亿立方米库水骤然倾下,如山崩地裂,声震数十里,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9万立方米/秒,在6小时内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量。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为12—15公里的洪流。与此同时,石漫滩水库8日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库内1.2亿立方米的水量以2.5—3万立方米/秒的流量,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

两大水库溃坝造成极其严重的洪涝灾害,由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1999年出版)书中记载,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

小型水库溃坝造成的灾害有时也相当大,如2012年8月10日,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涂沈家坑水库发生垮坝事故,造成10人死亡。沈家坑水库集雨面积0.26平方公里,坝型为土坝,坝高28.5米,总库容23.8万立方米。又如1999年9月浙江省乐清县特大洪水期间,上游十八垅水库溃坝,引发下游白水际水库溃坝。由此推测,良渚时期古城外围的水库同样会发生溃坝事故,更何况古代筑坝技术原始,坝体质量差,更容易发生溃坝,历史上东苕溪是我省洪灾严重的河流之一,东苕溪上游天目山区是浙江省暴雨中心之一,山高岭峻,坡陡流急,一旦发生特大山洪,很可能发生溃坝事故,直接给下游良渚古城带来重大灾害,甚至造成毁灭性灾害。

三、溃坝洪水计算

1. 溃坝坝址峰顶流量(最大流量)计算

溃坝坝址峰顶流量比较复杂,溃坝坝址峰顶流量的大小与坝址溃坝前上下游水深和坝址断面



形状及尺寸有关,而其计算方法根据于溃坝形式而定,瞬间全溃或逐渐溃。

良渚古城北部大遮山众多山谷集水面积小(不足 10 平方公里),古人修筑的水坝质量不高,一旦发生特大洪水,水坝全溃可能性很大,故此采用瞬间全溃形式估算坝址峰顶流量:

(1)矩形河床瞬间全溃坝址峰顶流量的计算公式

$$Q_m = 0.296BV\sqrt{g} H^{1.5} \quad (1)$$

(2)三角形河床瞬间全溃坝址峰顶流量的计算公式

$$Q_m = 0.115BV\sqrt{g} H^{1.5} \quad (2)$$

式中:

Q_m 为峰顶流量(立方米/秒);

B 为坝址河谷宽度(米);

H 为溃坝前上游水深(米);

g 为重力加速式度(9.8 米/秒²)。

考虑到上坝区河床呈“V”字形,采用(2)式

$$Q_m = 0.115BV\sqrt{g} H^{1.5}$$

设: $B=100m$ $H=15m$

$$Q_m = 0.115 * 100\sqrt{9.8 * 15^{1.5}} = 2091m^3/s$$

可见溃坝时的峰顶流量非常大。

2. 溃坝洪水量估算

溃坝洪水量即水库溃坝时的泄水量,与水库库容大小成正比,良渚上坝区单个水库库容如果在 10 万立方米上下,那么多个水库溃坝,总的下泄洪水量将达数十万立方米。下坝区水库蓄水量比上坝区更大,下泄洪水量可达数百万立方米。

四、灾害评估

良渚古城外郭城面积 6.31 平方公里,良渚古城城墙总体呈长方形,它既有防卫作用,也有防洪作用,南北纵长 900~1800 米,东西宽 1500~1700 米,总面积 2.9 平方公里。古城城墙底部宽度大多为 40~60 米,最宽处多达 100 米,高约 7 米。城墙一般底部先铺一层 20 厘米的青胶泥,再在上面铺设石块基础面,然后用黄土堆筑成墙体。城墙的中心区域才是 0.3 平方公里的宫殿区(莫角山)。

良渚古城位于低坝区东南部,两者距离约 3 公里,距离上坝区不足 10 千米,因此一旦水库溃

坝,下游古城难逃厄运。溃坝瞬间,坝身就被完全冲决,下游地基会被冲刷成巨大冲坑,坝址被完全破坏(这也许是某些河段没有发现古代水坝遗存的原因),超过1千万立方米/秒的溃坝洪峰流量滚滚倾泻而下,相距仅数千米的下游水库势必接连溃坝,加重灾害,给下游造成空前的灾难,在巨大流量和高速水流持续冲击下,坡度平缓的良渚古城城墙也将被冲垮,遭受灭顶之灾。而且,良渚古城靠近东苕溪,水库溃坝还会引起河流堤防溃决,造成大量河水涌入良渚古城。邻近良渚古城的东苕溪瓶窑镇以上集水面积1420平方千米,一次洪水总量可超过1亿立方米,这些洪水一起侵入30平方千米的良渚古城及其周围平原地区,必将

是汪洋一片,而且沼泽内的涝水一时难以排出。

概括上述分析,溃坝完全有可能摧垮良渚古城脆弱的生产要素和生活设施,急剧改变良渚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并且难以恢复,良渚先民在无法继续生存的条件下,只得选择离开,从而导致良渚古城湮灭、良渚文明短暂中断,因此良渚古城消失与水库溃坝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良渚文化在5300-4000年前中断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有:“海侵说”、“洪灾说”、“战争说”、“瘟疫说”、“沼泽说”等等。良渚古城周围水利系统被发现,使我们多了一种不详的推测:“溃坝说”。

(作者:浙江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



关于加快湖州水文化发展的 对策研究

□ 罗安生

湖州地处浙江北部、太湖南岸,是一座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城。熠熠生辉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兴水利、除水患”的治水史,孕育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水文化。挖掘、展示、传承、弘扬好这些水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梳理总结湖州千年治水发展历程,总结了湖州特色的水文化,研究分析了水文化发展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措施,希望研究成果对今后加快湖州水文化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湖州治水发展历程

湖州治水历史悠久,是整个太湖流域治水史的一个缩影。最早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湖州先民就开始从事原始水利活动。4000多年来,治水发展与区域人口、社会经济、科技生产变化密切相关,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特征。

第一阶段,围绕太湖滩涂的开沟整治期(新石器时代—秦汉时期)。这个时期,湖州地区还是一片沼泽地,人口十分稀少,被称为“荆蛮之地”。先民们开始开沟排水、整治水土、治理滩涂。夏朝时,就有舜、禹在太湖流域从事水利活动的传说。其中,防风氏是当地治水名人,在今德清武康一带,虽治理苕溪和太湖洪水有功,但因迟会被禹错杀。春秋时期,湖州属于吴越边界,两国均派重兵把

守,吴王曾在长兴修筑西湖;伍子胥修筑胥塘;范蠡修筑蠡塘。秦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封从兄将军刘贾为荆王,在长兴泗安以西筑塘,人称荆塘等等。

第二阶段,由于人口南迁的修塘筑圩期(三国时代—唐代)。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派陆逊在太湖一带屯田开垦,把山区居民迁至平原,圩田不断向沼泽地发展,形成了最初的圩田系统。为了防止太湖水入侵,东吴诸葛恪在长兴一带修筑了太湖大堤,之后吴景帝孙休在环太湖修筑了青塘。三国之后,北方屡经战乱,人口大规模南迁,促进了太湖流域的水利开发。晋代开浚修筑了著名的頔塘、谢塘、官塘。隋朝联通了京杭大运河。唐朝开始,经济重心南迁,太湖流域成为全国水利建设重点,修筑了一大批引水、蓄水、排水工程,圩堤也在这个时期初具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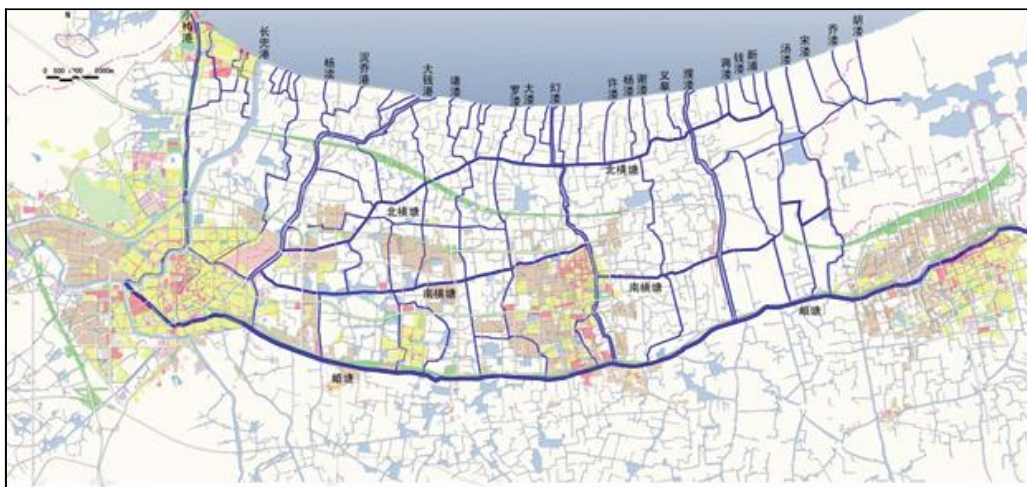
第三阶段,伴随国都南迁的广修水利期(宋代—民国时期)。南宋移都临安,中原地区大量臣民南迁,太湖流域人口激增,成为主要的居留地带。这个时期,湖州就有了专门的水利建设管理机构,广修水利,以疏浚河道、修筑堤塘为主,山丘区的塘坝等灌溉工程也有所建树。期间随着朝代更替,水利建设时有兴废,但始终高度重视太湖溇港的浚治和管理。民国开始,引进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修建了防洪排涝抗旱工程,购置了少

量的抽水机器，湖州最早的水电和机电排灌系统开始启蒙。

第四阶段,依托现代科技的大兴水利期(新中国成立—1990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湖州水利建设进入高峰期,按照“上拦、中导、下泄”的思路,引、提、排结合,建成了大量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兴办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期间,建成了水库 150 座,山塘 7000 多座,电力排灌站 5000 座、水电站 129 座。兴建了苕溪分流、导流,合溪新

港、太湖溇港、西险大塘等重点水利工程。这个时期,湖州水利工程建设范围之广、工程之多、类型之全,在历史上到了空前的高度。

第五阶段,依托太湖治理的控制水患期(1990年至今)。这一阶段湖州牢牢抓住国家重视太湖治理的政策机遇,深入谋划和建设治太骨干工程,掀起了新一轮的水利建设高潮。建设规模之大、投入资金之多、综合效益之好是前所未有的,实现了基本控制水患的历史性目标。1991年、1999年太湖两次发生超标准的特大洪水,对环太湖地区,尤其



是杭嘉湖平原造成重大灾害损失。湖州痛下决心,加大投入,发动军民大会战,建成了一批关键性防洪排涝工程。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安吉余村考察,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2005年以来,湖州牢记总书记嘱托,深入实施太湖治理,从单一的水安全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并重转变,大力推进流域系统整治。浙江省委提出“五水共治”重大决策部署,湖州治水开始“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措并举、多管齐下,取得了显著成效。最具代表性的是投入115亿元,建设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四大重点水利工程,强化骨干水系沟通,打通联通太湖的“主动脉”。之后,又谋划了三大后续项目,进一步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二、湖州特色的水文化

4000多年的治水历史,催生出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湖州水文化。这些水文化作为湖州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家喻户晓,甚至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个方面:

一是溇港文化。溇港是太湖流域特有的水利工程,在太湖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湖州拥有环太湖发端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溇港体系,始于春秋时期,经过2000多年的开凿浚治,已经形成庞大的体系。正是由于溇港的出现,才将南太湖这个“水乡泽国、洳湿之地”改造成为“灌排自如、稳产高产”的沃土良田,成就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溇港不仅孕育了杭嘉湖文明,也由此催生了著名的溇港文化。

二是运河文化。流经湖州的京杭大运河,横贯大江南北,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催生了如“南浔、练市、新市、双林”等千年古镇,形成了丰富的运河文化。从历史来看,大运河不仅是航运的通道、贸易的通道、文化的通道,而且解决了在封建

时期文化经济交流渠道难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开凿大运河为中华民族过去和将来更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和经济基础。

三是苕溪文化。东西苕溪是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是太湖流域的重要支流。由于流域内沿河各地盛长芦苇,进入秋天,芦花飘散水上如飞雪,引人注目,当地居民称芦花为“苕”,故名苕溪。东西苕溪是湖州的母亲河,哺育了世代代的湖州人,催生了特色的苕溪文化。自古以来,咏诵苕溪的诗句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元代戴表元的“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以这位代表的苕溪文化已成为一张代表湖州的靓丽名片。

四是治太文化。湖州北滨太湖,既受湖之利,也受湖之患。长期以来,湖州在开发利用太湖和防御太湖洪水实践中,形成了灿烂的太湖文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州经受了多轮太湖洪泛,造成了严重灾害损失。湖州痛下决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广大市民投工投劳,实施了多轮治太工程建设,目前已基本消除太湖洪泛影响,形成丰富的治太文化。

五是名人文化。防风氏治水与大禹治水属于同一时期,而且与大禹密切关联,“禹勿戮防风”的传说已记载流传至今。正是由于防风文化有“神话色彩”的外衣,因此很晚才得到史学专家认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一大批史料记载、七处防风庙遗址和三十则流传的防风神话传说被发现,防风文化的历史研究价值逐渐被国内外认可。明代潘季驯是湖州籍治水名人,束水攻沙的治黄理念亦被沿用至今,成为治太的典范。

三、湖州水文化发展成果及存在问题

多年来,湖州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了水文化的发展和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一是形成了一批水文化研究成果。组织

开展了对溇港文化、运河文化、防风文化、潘季驯、塘浦(溇港)圩田、西苕溪、南太湖、桑基鱼塘、桑基圩田以及荻港等水文化研究,出版了《苕溪运河志》《湖州市水利志》《三县水利志》《水库志》《吴兴溇港文化史》《防风文化》等刊物,形成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二是修复了一批水文化建筑遗存。大力推进防风古国、溇港、运河、頔塘、湖嘉申航道、区域各类历史遗存、遗迹的修复和保护工作,有效保护了遗存原貌。对毗山古人工水道(大沟)和竹木围堰等均作了精心的测绘,保护并拍摄了大量文献资料。三是建成了一批水文化宣传场馆。先后建成了吴兴溇港文化展示馆,规划建设了溇港风景区和防风风景区,修建了“治太工程纪念碑”。在水工程设计时也十分注重水文化,如湖州船闸、毗山水闸、天赋度假村、太湖山庄等设计都包含了浓郁的水文化元素。四是申报了一批水文化历史遗产。太湖溇港成功申报第三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桑基鱼塘成功申报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防风文化已经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人类文明史留下了“湖州印记”。五是开展了一批水文化宣传活动。每年“世界水日”和科普宣传周期间,各市区在广场、社区和报刊、电视、广播、宣传窗上发表宣传文章,开展水法宣传教育和知识竞赛,开展水文化宣传。先后组织拍摄了黄金水道、黄浦探源、塘浦圩田、溇港等水文化宣传片,湖州日报、湖州晚报、湖州广播电视报也一直注重和加强水文化报道。

虽然湖州水文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长期以来对水文化建设的习惯性忽视和认识性不足,使得水文化发展水平与文化建设总体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研究挖掘不够,水文化内容不够丰富。目前湖州水文化研究体系还不够健全,缺乏权威的工作交流平台,导致水文献出版数量少,层次不高,权威的水文化专

业学术刊物比较缺乏,水文化的学术成果还不能融入到主流文化研究之中,与湖州丰富的水文化内涵不相适应。二是建设提升不够,水文化设施不够健全。湖州各地水文化场馆为数不多,而且规模比较小,与湖州丰富的水文化有明显差距。三是宣传教育不够,水文化知识不够普及。多年来各级尽管开展了一定的水文化宣传,但深度和广度仍然不够,还没有渗透到乡村、社区、媒体、学校,溇港、防风、治太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水文化尚未广泛被湖州老百姓所熟知。四是交流推介不够,水文化影响不够深远。湖州水文化缺少在省级以上报、刊、网、馆等传播媒体上的宣传,缺少在国内外平台论坛上展示,也缺乏与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互动交流,因此知名度不高,影响力、竞争力仍然不强。像溇港文化、防风文化等湖州“独一无二”的特色水文化,还没有真正推向全国、走向世界。五是支撑发展不够,水文化产业不够壮大。湖州的水利风景区建设积极性不够高,目前全市只有5个规模较小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3个省级水利风景区,溇港文化风景区、防风古国风景区等还在筹划阶段,整个水文化旅游产业还没有真正培育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另外,水文化衍生出的文艺活动、艺术作品等产业还未形成体系。

四、加快湖州水文化发展的对策措施

发展湖州水文化,旨在普及湖州水情,展示治水成效,使公众对湖州治水历史有清楚明晰的了解,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唤起公众对治水兴水的认知和支持。今后湖州发展水文化的目标是建设水文化名城。具体要达到五个方面:1.水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就是有一支专业的队伍,通过持续不断地研究和挖掘湖州治水历史,提出丰富研究成果和作品,弘扬湖州水文化。2.水文化设施更加健全,要加强水文化馆、教育基地、景观带、风景区的建设,

保护水利文化历史遗存,全面提升涉水工程的文化内涵和品位。3.水文化知识更加普及,通过水文化的宣传教育,让湖州特色的水文化更加深入人心,群众爱水、护水的自律意识明显提升,群众性的水文化活动明显增多,水文化艺术创作的成果更加丰富。4.水文化影响更加深远,就是要向外界宣传推广湖州特色的水文化,努力让湖州水文化走向国门、迈向世界,在全国水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5.水文化的产业更加壮大,大力发展水文化产业,培育产业化、体系化特色水文化品牌。

围绕这五大目标,建议落实五项措施:

(一)进一步深入挖掘湖州水文化内涵。湖州水文化历史悠久,产生了不少治水名人,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水文化艺术作品,也留下了大量光辉灿烂的水文化遗产,这些是湖州水利创造力的体现,是水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要落实专业力量,梳理全、挖掘深、研究透湖州的特色水文化,丰富其内涵。挖掘“特色文化”。在现有的潞港文化、防风文化、运河文化、苕溪文化、治太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再深入研究水库文化、湖漾文化、桑基鱼塘文化、塘浦圩田文化、漕运文化,构成“湖州十大特色水文化”。要深入挖掘这些水文化的历史内涵,编辑出版一批水文化的专业丛书,真正形成与“国内知名的水文化名城”相匹配的水文化内涵和底蕴。挖掘“治水名人”。深入研究尧、舜、禹、范蠡、伍子胥、皋伯通、谢安、殷康、姚峤、沈攸之、黄向、颜真卿、于頔、崔元亮、杨汉公、钱鏐、苏轼、赵霖、单锷、夏原吉、潘季驯、范硕、黄郛、沈百先、王大毛、张瑞祥等名人在湖州治水的历史典故,梳理挖掘出湖州“十大治水名人”,编写人物传记。挖掘“水利遗址”。开展水文化遗产普查,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切实加强潞港、防风古国、毗山、钱山漾、三城三圻、下菰城、安城、掘步嶺古陂塘、古堰坝、双林

三姐妹桥等“湖州十大水文化遗址”的保护修复,深入挖掘这些遗址的历史价值,形成一批权威的遗址研究成果。充分发挥水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划定水文化保护区域,结合水利风景区建设,开发水文化旅游精品。挖掘“水利诗词”。梳理历代文人墨客咏诵太湖、苕溪、潞港、圩田的诗词歌赋,梳理出张志和的《渔父词》、朱庆余的《吴兴新堤》、米芾的《苕溪诗》、苏轼的《登岷山》、赵孟頫的《吴兴赋》、《题苕溪》、戴表元的“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杨维禎的《山水歌》、韩奕的《湖州道中》、余怀的《苕溪四时歌》、厉鹗的《泛舟碧浪湖》等十大水利诗词,出版一套湖州水利诗词丛书。

(二)进一步提升完善水文化基础设施。水文化场馆是保存水文化遗产、开展水文化教育和展示治水成果的有效载体,是湖州水文化发展建设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利用湖州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建设多种类型的水文化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水文化基地的教育、休闲、环境保护等功能。谋划建设一个综合场馆。湖州有着几千年前的治水历史,近年来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水共治”,治水成效十分突出,建设一个综合性的水文化馆十分必要,是湖州水文化建设的“头等大事、一号工程”。水文化馆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模拟展示治水历史,供市民参观,真正让湖州人牢记治水历史,形成节水、爱水、护水的良好风尚。谋划建设一批专题场馆。除了建设综合性的水文化馆以外,要参照德清水文化馆、吴兴义皋文化展示馆等,建设一批专题的水文化展示馆,重点是建设潘季驯纪念馆、治太纪念馆、防风文化纪念馆等做法。同时要参照安吉水保科技示范园等做法,建设一批基于水利枢纽工程、湖泊漾荡湿地、城市水景观的水文化教育基地、水文化公园。谋划建设一批示范工程。要把水文化元素融入到水利工程规划、

设计、建设、验收的全过程,注重水工程的哲学性、艺术性、科技型、景观性和历史性,切实提高水工程的文化品位,打造一批水文化示范样板工程,做到“水下是工程、水上是文化”,做到“既有现代科技支撑,又有古朴历史文化风韵”。打造一批水文化景观带。加强统一规划,挖掘人文历史,突出水文化的承载功能,打造一批以河道、湿地、绿道、水库等水利工程为核心的水景观,积极申报国家级、省级水利风景区、国家级省级生态湿地。系统整合水文化资源,优化布局水文化景点,构建水文化景观带,各地水文化特色品牌。比如吴兴打造太湖溇港水文化风景带、德清打造防风古国水文化风景带、现代水利示范区等。

(三)进一步宣传普及湖州水文化知识。水文化博大精深,在华夏文明史中占据特殊地位,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全面普及水文化知识,是传承、发展和弘扬水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水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开启水文化心智,增强水忧患意识,培育人们“节水、护水、爱水、亲水”情怀,实现全社会人水和谐共处的行动自觉。宣传进机关。在各级各部门深入开展水文化宣传,让广大公务人员了解湖州水情、了解湖州的治水历史,了解水法律法规。在行政管理中,更加注重治水工作,更加注重水利遗产的保护,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宣传进校园。要在中小学开设节水教育相关课程,以启蒙式教育为主,增加情景教育环节,让学生了解用水的规范,了解节水常识。同时,在高等院校开设湖州水文化课程,把水文研究内容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鼓励高等院校的老师、学生广泛开展湖州水文化研究,多出理论研究成果。宣传进媒体。要把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结合起来,在广泛发挥电视、电台、报纸等传统媒体功能的同时,充分利用好公报、简报、网站、微信、微博、图书、音像、展览等多种媒体平台,加强水文化的宣传,提升宣传效果。在网络宣传方面,要进

一步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使网络宣传与传统宣传形成合力。在媒体电视上,加快治水工作、水利建设成果的音视频转化。宣传进社区。在中国水日、世界水周、全国防灾减灾日、湖州生态文明日等系列宣传活动中,增加水文化的内容,深入开展水文化进社区、乡村活动,提高互动能力与群众参与度,增进全社会对治水工作的理解,增强群众对治水攻坚的支持力度。

(四)进一步提高湖州水文化知名度、影响力。湖州水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但在国内国外还缺乏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下决心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使得水文化知名度与“水文化名城”相适应。一是谋划建设全国水文化建设试点、示范城市。要完成全国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建设,高水平通过水利部的验收并完成命名。要积极申报并列入全国、全省水文化、水生态建设相关试点,打造湖州水文化的特色品牌。二是申报世界级、国家级水文化遗产。在京杭大运河文化、太湖溇港、防风氏的基础上,再谋划申报一批世界级、国家级水文化遗产,形成一大批湖州水文化的特色“金名片”进一步提高湖州水文化在国内国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加强央媒、省媒的水文化宣传。要加强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浙江日报、浙江卫视、浙江水文化等省级媒体的合作,持续加强水文化宣传。重点培育《中国水利报》、《中国水利》杂志、《中国水文化》杂志、《中国水文化网》、《水利文明网》等宣传阵地,提高宣传的影响力。四是加强湖州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建立水文化交流互动机制,加强沿太湖、市际的联系与协作,提升水文化发展水平。举办湖州水文化论坛,召开水文化研究专家咨询会,进而承办国家级、流域级、省级水文化论坛,在更高层面上开展水文化交流研究,提高水文化的影响力。加强与水利部、省水利厅相关单位、水利专业委员会和科研院所、高校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努力形成更多权威研

究成果。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水文化活动。

(五)进一步发展壮大湖州水文化产业。一是开发水文化旅游业。湖州水文化旅游资源不仅涵盖了太湖、苕溪、漾荡、河道,而且包含了桥、船、镇、园等诸多文化形态。要精准把握其文化内涵,合理开发利用丰富的水文化旅游资源;整体规划、合理开发、精选线路,构建立体水文化旅游网络;以水工程、水景观、水文化为载体,以文化旅游部门为依托开发水文化旅游业,培育精品。打造湖州特色的水文化旅游产品,包括太湖文化、浚港文化、防风文化等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二是发展水文化创意产业。大力倡导和积极支持水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构建水文

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平台,推动水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积极推动水文化展演、时尚休闲创意项目、水文化体验项目,打造特色产业带。加快涉水文化艺术、创意设计、传媒产业等载体建设,采用招商引资、本地孵化、兴办产业园等方式,鼓励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意文化产品。三是激励水文化艺术创作。建立水文化艺术创作激励机制,鼓励专业和民间人士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加强水文化资源调配整合,大力培育水文化艺术人才,积极扶持社会水文化艺术团队,不断创新水文化活动载体,助推产生更多的水文化艺术精品。

(作者:湖州市水利局局长)





□蒋剑勇

一、引言

在浙江主要的江河中，曹娥江是唯一因人命名的。相传曹娥江最早叫舜江，是虞舜避丹朱之乱来上虞、率百官治江害而得名。后来又因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到了汉桓帝元嘉一年（公元151年）被刚来上虞上任的县令度尚所闻，为表彰曹娥之孝，遂将舜江改名为曹娥江。

曹娥是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一位孝女，其孝行最早见于东晋虞预的《会稽典录》：“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涛而上，为水所掩，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于江而死。县长度尚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礼为之作碑[1]。后被南朝范晔载入《后汉书·列女传》：“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

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亦谓：“江之道南有曹碑。娥父盱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踊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沈；若不值，衣当浮。’裁落便沈，娥遂于沈处赴水而死。”从此以后，在地方政府和一些文人学士的倡导和渲染下，曹娥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孝女的典范。

有学者研究表明，曹娥实际上是一位巫女，而对其孝女形象的塑造，是度尚以“神道设教”、因势利导、将中原儒家伦常观念植入曹娥故事的结果。当时，会稽地域进入了一个原始土著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时期，地域文化迈开了由原始土著文化向先进儒家文化转型的步伐。

孝女曹娥的故事，正是两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体现和产物。(李小红,2009)

因此,曹娥因人名江是对其孝道的表彰,更是占据文化主流地位的中原儒家伦理纲常的推广以及会稽地域文化转型的成果。中国的孝文化渊源久远,发端于原始社会的宗教崇拜,到了西周时期,孝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初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经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阐释而上升为个人、家庭、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汉初,经由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孝最终转化为“治天下”的政治工具。(王翠,2013)

那么,在古代的中国,孝道为什么会成为被大力倡导并被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规范呢?笔者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寻找可能的原因,阐释其背后隐含的理论含意,并通过古今的对照与中外的比较进行事实的验证。

二、孝文化成因的经济解释 ——假说的提出

孝道成为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的时期,古代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在这个农业社会中,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每一个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相当于一家公司,对资源的使用进行有效配置,也需要对如何消费作出合理安排。由于产权界定的需要,家庭必然会形成一个权威,家长是天然的权威,并以此延伸到整个家族,从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体系。这个等级制度是为了降低租值消散而形成的。在这个等级制度下,家庭或家族内是以等级来分配资源的,对外则是交易的方式。于是,在家庭内,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利,包括对于物质资源如土地、房产等的产权,还拥有对于子女的强制性产权(张五常,2002)。但是,子女是人,人区别于物的关键在于有自主意识;特别是在子女成人、成家之后,就会有获得自主以及家庭产权的需求。因此,为了维系家庭经营方式的稳固,需要有一种机制

来规范这种产权安排。于是,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倡导的伦理道德规范就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乃至后来上升到了治国之道的层面。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社会中,为了维持这种产权制度的稳定性,孝道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具有非常强烈的约束作用,起到了社会稳定剂的作用。因此,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极力地维护这种机制的有效性。所以,曹娥这样的事迹,自然成为官方推广儒家伦理纲常的绝好契机,影响会稽地域的土著文化,使之得以转型。

那么,古代社会为什么会形成家长制的产权制度呢?在古代社会,养老不是由社会解决的,是要依靠家庭自身的,所以我们有“养儿防老”的说法。也就是说,父母有责任抚养子女成人,而子女在父母年老时则有赡养的义务;经济学的含意是,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是一种对于自己年老时消费的一种长期投资。形成这种消费投资机制的关键在于,人在未成年工作之前没有收入,但是需要消费。原则上,根据经济学的分离定律,消费与投资可以分开来决策,也就是在没有收入的时候,可以借钱进行消费,当长大工作有收入后再来偿还。而在年青的时候可以进行投资或储蓄,老的时候没有能力工作获得收入之时用投资获得的收入或年轻时候的储蓄进行消费。但是,问题是小孩在成年之前需要获得借贷来维持消费,要等他长大成人有能力偿还借款,这段时间很长,这意味着风险很大,也就是贷款人判断借款人偿还能力的信息费用很高。于是,要制定这种合约的交易费用很高,更何况签约当事人当时根本没有基本的民事能力;除非有相应的担保制度,否则当事人日后违约的可能性也很大。总的来说,虽然明文的抚养投资合约会大大降低合约的履行费用,但是当时的签约费用会高不可攀。由此看见,处于父母对于子女的爱,家长与子女间签订合约的费用就会大大下降。然而,父母对于子女投资的回报要等到很多年

后才能实现,而子女是否能对父母履行赡养的合约也有疑问,这表明,合约履行的交易费用会比明文规定的要高。于是,需要建立某一种制度来维护这样合约的有效性,那就是家长制的产权制度;并以孝文化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进一步巩固这种产权制度。当然,这也包括了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不停地灌输这种伦理道德,使之成为子女的行为规范。

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农业社会家庭养老的局限条件下,孝文化是维系家长制产权制度的有效规范机制,也有利于降低父母与子女间签订投资消费合约的交易费用。

三、工业社会与社会养老 ——假说的验证

上文的分析表明,孝文化形成的背景是农业社会与家庭养老制度;这一点上,中国古代与西方国家有相似之处。因此,对父母孝敬不仅是古代中国的伦理道德规范,古代西方国家也有孝的传统,如《圣经》诫命十条中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而十七世纪的英国法律还有关于孝的条款,规定成年子女要承担父母的经济债务。

在十八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大生产打破了原来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模式,人们经常流动,并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迁徙。于是,父母对于成年的控制力大为下降,而子女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得到了体现,不再需要家庭提供资本。于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就出现了危机,应运而生的社会养老模式便有了日益强烈的需求。从开始的教会、私人慈善发展到后来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养老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以及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专业化,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金融体系,使得传统的家庭失去了医疗、养老保险、融资等功能。因此,孝文化在西方国家逐步失去了

其生存的根基,发展到现代社会,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在西方国家,人们的家庭观念比较淡薄,并不推崇孝道。

我国工业化的时间不过几十年,而社会福利制度到目前为止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模式的实行近些年才开始普及。因此,我们发现,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对于孝道的推崇更为普遍。即使如此,随着中国家庭的进一步核心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日趋式微,父母子女之间的日常交往也就无可避免地减少。更为关键的是,家庭传统功能的消弱,特别是社会养老模式的普及与深入,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也大为减轻,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可能需要有新的着力点。

四、结论与启示

“曹娥投江救父”的故事流传千年,其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颇为深远。曹娥因人名江是对其孝道的表彰,更是占据文化主流地位的中原儒家伦理纲常的推广以及会稽地域文化转型的成果。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在农业社会家庭养老的局限条件下,以曹娥为代表的孝文化是古代中国维系家长制产权制度的规范机制,也有利于降低父母与子女间签订投资消费合约的交易费用。

随着中国家庭的进一步核心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日趋式微,家庭传统功能的弱化、特别是社会养老模式的普及与深入,传统孝文化可能会面临日益淡化的局面。若要重新倡导孝文化,我们需要寻找新时期孝道背后的根本内涵,培育孝文化根植的社会基础,探索其蕴含的核心价值,才能使得孝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规范,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

(作者: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教授 博士 水文化与水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一、北湖的开挖以及淤积情况

余杭南湖和北湖是东苕溪上游最早的分洪、滞洪工程,也是太湖流域兴筑最早、规模较大的人工湖泊,具有蓄水、灌溉和防洪的功能。北湖位于余姚瓶窑镇西南,中苕溪左岸,介于中、北苕溪之间,原为一片草荡,古称天荒荡,今称北湖草荡,土名仇山草荡。历史文献中关于北湖最早的记载为《新唐书·地理志》:“北三里有北湖,亦珽所开,溉田千余顷。珽又筑甬道,通西北大路,行旅无山水之患。”由此可见,北湖的开辟跟当时浙西的水系及其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联。

浙西境内最大的水系为苕溪,其发源于东西天目山。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一出天目山之阴。出天目山之阳者,……一曰南苕溪,一曰中苕溪,一曰北苕溪,总称东苕溪。”苕溪流域发源地天目山是个暴雨中心,洪水多发地,常常造成下游三角洲严重内涝。因此,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当

地的水利治理。余杭位于东苕溪上游地区,上承天目山系诸水,下贯杭、嘉、湖三府。溪水流至余杭扇形地,襟带山川,地势平彻,易成洪涝,所以余杭“堤防之设,比他邑尤为重要。余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廓”。东汉熹平年间(172-177年),余杭县令陈浑于县城西南筑塘围湖,凿涵导洪,分杀苕溪水势。唐宝历元年(825年),归珽出任余杭县令。当时南湖年久失修,湮废严重,归珽遂“因其旧,增修南上、下两湖,溉田千余顷,民以富实”。此外,他还在瓶窑镇附近开辟北湖,蓄水泄洪,调节中、北苕溪之水,灌溉农田千余顷。据《惠泽祠碑记》载:“昔洪水冲决堤岸,功用弗成。公与神誓,‘民遭此水溺,不能拯救,是某不职也。神矜于民,亦何忍视其灾!’堤由是筑就。至今,人名之曰‘归长官塘’。”

关于北湖原来的位置以及面积大小,由于记载较少,加上图籍经久失传,故而无可考证。清嘉庆《余杭县志》称:余杭北湖“在县北五里,周六十

里,引苕溪诸水以灌民田”。民国时期,德清地方士绅许炳堃在《浙西水利刍议》一文中说:“考余杭北门外新岭南北之地势,均极低洼。宣统三年水满,至石凉亭之屋顶可乘船至新岭之半腰。以今之情形,证古之传志,新岭南北周五六十里之地,或即为北湖遗址。然以何处为界趾,则无。指名询诸就地父老,只知仇山十八垵,皆侵占北湖而成田者”。根据实地考察,他认为“北湖之界应北至北苕溪之险塘,东至南苕溪之险塘,西北至陶村港、漕桥港合流处,东南至何家陡门,西至中苕溪,在沙塘村出口处”。浙江水利局第二测量队队长赵震有参考晚近图志,并结合实地察勘,对北湖的界线有更加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北湖之界“东至南苕溪之险塘,东南至西涵陡门,西北至曹桥,西至小横山,北至北苕溪之险塘,南至西山,周围六十里有奇,面积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余亩(内仇山占积八百四十亩,土壩占积五百五十亩)。幅员辽阔,三倍南湖”。

关于北湖堤塘的高度,历代的方志中多有记载。咸淳《临安志》载:“其源出诸山,塘高一丈,广二丈五尺,以其在县北,故名北湖”。嘉庆《余杭县志》记述云:“塘高一丈二尺,上广一丈七尺,下广二丈二尺”。康熙《余杭县志》云:“查湖县北三十五里,源出诸山,即后汉所封摇泰之湖,溉田甚广。塘高一丈,上广一丈七尺,下广二丈二尺”。

汉代,陈浑在余杭县南开挖南湖,筑塘汇水,主要是调节南苕溪上游的水量,防止县城直接遭受洪水冲激。康熙《余杭县志》载:“余水自天目,万山涨暴,而悍籍南湖,以为渚泄。修筑得宜,不独全邑倚命,三吴实嘉赖之”。民国时期,余杭地方人士傅仁祺也曾说:“谈苕溪水利者,莫不颂及南湖”。唐代,余杭县令归珧又继而开辟北湖,蓄水泄洪,调节中、北苕溪之水,灌溉农田。但相比南湖,北湖地处偏僻、湖区广阔,自从开挖之后,一直未加疏浚,导致湖底淤垫,乡民围垦,湖面日促,淤积情况比南湖更加严重。

1928年,汪胡桢等人根据浙江陆军测量局在1914年所测地形图对北湖面积进行计量,未垦区域“四周不及三十里,面积不过二十三方里,合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亩”。1931年江浙地区发生重大水灾,时人曾评述:“北湖面积五万余亩,今则庐舍桑麻,均成村落,容受之量,因此锐减”。1936年太湖水利委员会第二设计测量队长章锡绶对北湖进行实地勘察,他在报告中说:“至于北湖之情形,则更非南湖可比,非特历年无人修治,且已大部分成田,无复湖形。蓄洩之能力,仅在未垦殖小部分,约1.72 km²的面积,于最大洪水位时,如民国十一年者,尚能容蓄二公尺之水量而已。至于低于民国十一年之洪水位,而足以为地方之灾者,仍不能灌入暂储,以为救急之用”。

南北湖的淤塞,导致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在夏季往往发生洪灾。对此,浙江水利局以及当时的水利专家都有评述。浙江水利局在分析苕溪流域受灾的原因时说:“上游有甚大致水源面积,而溪道多在峡谷中,地势下倾特甚,不易蓄洪,山水一发,即一泄而下。上游无蓄水之湖荡,或其他蓄水设备,即东苕溪之南北湖亦淤塞失用”。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孙辅世在东苕溪防洪初步计划视察报告中也曾说到:“惟瓶窑以下,地势平坦,两岸均赖堤防。东堤关系余杭、杭县、德清、吴兴一带之农田者甚巨,而近年南北湖之效用渐弱,更易漫溢。民国十一年及二十年,均蒙其害,实为整理东苕溪之主要问题所在”。章锡绶在东苕溪防灾计划中指出:“两湖(南湖和北湖)之效用,日趋荒废,无怪东苕溪之灾患日趋严重。换言之,即东苕溪潦旱之灾患,实系蓄洩之能运用否也”。

二、清末及民国北湖的浚治与争议

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南湖自东汉陈浑开挖以来,较大规模的疏浚次数达十余次。而北湖自唐代以后,历朝政府几乎都未加以浚治,直到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粮储道廖寿丰修浚相公庙一带,拨营兵五百人挑濬北湖,三年完成,“其时尚有湖基万余亩及西溪、南山等草荡共数千亩。”光绪十三年(1887年),城绅前户部左侍郎王文韶等呈称:“余杭县南北两湖全行淤塞,有关杭嘉湖三郡水利,呈乞筹款浚治。又以两湖并举无此巨款,请先浚北湖”。对此,浙江巡抚刘秉璋给予批准,并“札布政使孙嘉谷、粮道廖寿丰,会同绅士丁丙、仲学轺筹议章程,核办所需经费,在粮道廖寿丰捐存浚湖经费五千两项下支给,如有不敷,再动善后经费。”邑绅仲学轺为瓶窑镇长命仲家村人,是开浚北湖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苕溪隶杭州者为上游,水势猛厉,经嘉兴湖州者为下游,水势宽缓,故重上游,上游尤重钱塘一节,十塘五闸,独扼险要,以卫杭嘉湖三郡田庐,其持以分水势稍缓冲激者,首在余杭之北湖,次在南湖”。

接到浙江巡抚刘秉璋的批示之后,孙嘉谷、廖寿丰和邑绅丁丙等人立即准备浚湖事宜。这时余杭士绅董震向知县路保和提议优先开浚南湖,其理由为“北湖之利不及南湖,与其先浚北湖,工钜而利仅一隅,不若先浚南湖,工省而惠及三郡”。在双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刘秉璋饬令杭州府吴世荣会同地方士绅前往现场查勘。结果,又提出了第三种意见,即南北两湖均宜开浚,只是工程浩大,经费难筹,故而可以先挑浚竹木河,再浚南湖,汤湾以下先挖河中积沙,兼培南北塘堤,再浚北湖。最后,因浚湖的经费没有得到解决,开浚一事只好作罢。实际上,明清以来地方政府以及乡绅关于浚湖问题经常时常发生争议,比如萧山湘湖就因为垦湖种植和产权问题而不断引发纠纷。

同为东苕溪上游的分洪、滞洪工程,为何两湖的浚治情况有这么大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跟两者的地理位置和疏浚工程费用有极大的关系。许炳堃在《浙西水利刍议》一文中论述了北湖面积较南湖大数倍,因而疏浚较难。他说:“北湖当南、北、

中三苕溪会合之冲,与南湖之仅受南苕一溪之水者,较水量多寡相去倍蓰。故其面积亦较南湖为大,徙以僻,在北乡无人注意。故南湖之浚,诸家记载代有篇章,开濬之事,亦每阅数十年而一举”。光绪十六年(1890年),浙江巡抚崧骏奉上谕对南湖进行疏浚,他对南北湖浚治的难易有这样的评述:“南北两湖同为三苕暴涨分滞之地,均已淤高。然南湖界址犹存,多浚一尺,即有一尺之利。北湖涨退之后,一望平原,旁无崖岸,工程尤巨,无从措办”。由此可见,北湖位置较偏北,且面积比南湖大数倍,加上一直没有得到浚治,淤积情况比较严重。故而要对其进行疏浚,无论是人力和财力都比疏浚南湖花费要多,并且效果不一定理想。

尽管清光绪年间廖寿丰对北湖进行挑浚,恢复湖基一万余亩,但是到了民国时候,客民不断垦殖,当时就有“挑草荡一担泥,年多余杭一石米”的俗语。1915年春,许炳堃亲自前往北湖进行实地调查,结果不容乐观,昔日恢复的湖基,“今又桑田交错、草舍相连,只未筑隄拒水,佔作坝田耳。然久而不治,必渐有筑隄者,隄成则北湖痕迹更荡然无存矣。北湖久不挑濬,而光绪初年尚有万数千亩,今不出三十年而侵占如此之甚者”。

1916年,浙江省水利局第二测量队队长赵震有对三苕的地理环境进行实地勘察后分析说:“南、北二苕环束东北,中苕横贯湖中,天目万山之



水由此过脉如沟浚。然中、南二苕直趋余杭之汤湾渡,两水会合,北行五里至瓶窑之相公庙,北苕来注之,此为三苕会合之处”。故而,他认为北湖的形状为三角形,“巨浸适当其冲,承受三苕之流,停顿湍急之势,与南湖仅受南苕一溪之水者,其水量多寡相去倍蓰,故北湖之形势较南湖尤为险要也”。对此,赵震有提出解决浙西水利的正本清源之道,即“三苕亦宜择要与北湖并加疏浚”,且修浚之举“不能视为缓图”。同时,他还对疏浚三苕和北湖的工程费用进行了概算。

除了赵震有之外,余杭北一区自治委员施广福也认为治本之要唯有开浚北湖,这样才能保证“上有容纳之量,下无冲突之虞”。他认为,疏浚北湖主要有三利:“其利一,潦则藉以储蓄,旱则资以灌溉;其利二,瘠土化为腴壤,险塘永庆安澜;其利三,但言之匪艰,行之惟艰。”对于时人所说的“工程之钜需数十万,际此财政竭绌之时,安能办此不急之务?”他却大不为然,认为如果北湖一年不遭水患,“丰收何可臆算,一邑计之固不足,三郡计之则有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浙江省政府鉴于北湖“年久失修,淤成平陆,强豪侵占,填地垦植桑竹”,而“湖泽有关农田灌溉,年久淤塞者急应修理,以利耕泄”,遂组织清理委员会对北湖进行实地测量和勘界。由于历代乡民垦殖,湖界已经模糊不清,以致在清丈过程中时有纠纷发生。1933年,余杭县商会、农会、教育会电呈浙江省政府,称

清理界址委员会组织的清丈队将本在北湖在身之外的姚坝、黄坝、蔡家塘、李坝、仇山塘等处划入界湖以内,遍竖红椿,以致数千农民非常惶骇。随后,浙江省政府飭令浙江水利局进行审核,清理余杭北湖界址委员会遂召开第五次常会,并议决“根据杭州府志、余杭县志、北湖地形图及本会调查报告,说明各坝塘在北湖范围以内”。对此,余杭和德清县农会等机构表示不满,再次呈请浙江省政府复议。最后,经界址委员会第七次委员会议议决:一是苕溪测量尚存进行,将来测竣后,计划之时,必须择适当地点建筑蓄水库,如在北湖范围之内,应尽先使用北湖草荡及仇山草荡等处,至姚坝、黄坝,应视所需蓄水量之多寡,酌量情形,分别先后办理。二是此次清理之后,应请重申禁令,姚坝、黄坝不准再行升科,北湖草荡及仇山草荡等处应禁止升科及开垦,嗣后如有围垦情形,即可证明侵占。然而由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清理委员会并没有对北湖进行有效的浚治。

从北湖的浚治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中国水利发展史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地方水利事业也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西方先进的科技理论和工程技术逐渐替代了中国古代的治河思想和水利技术,但是由于受到人力、资金、技术、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民国时期水利建设举步维艰。

(作者: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王锡彪

天生一，一生水，水生万物。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文明之源。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治水的历史。水文化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



2017年丽水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开展水文化遗产普查，从过去纯粹的水工程建设、上升到当前的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如今又提升到更高

层面的水文化探索与引领。在眼下水文化古迹遗址还没有完全被湮没，人们对古时水文化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失，开展水文化遗产普查是一件非常及时和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欣然接受这个老内容新任务时，才感觉到它的博大精深与任务繁重。原本认为小小的云和县域，没有多少水文化遗产元素，却越挖越深，越查越多，在每一处古迹遗址、非遗习俗的背后都凝结着古人的聪明智慧、工匠精神和精彩故事。



季宽游泳池

当八百里瓯江以 Z 字形穿过云和大地一百里,瓯江帆影才刚刚远去,瓯江木排激流中搏击的场景还残留在人们的记忆。是先民们在瓯江两岸开荒劈地,修筑埠渡,开辟了瓯江黄金水道,繁华了云和境内的水上交通。把浙西南的原木、瓷器以及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外地,再把大米、食盐、海鲜以及日常用品运到本埠。如果说当年龙泉是瓷器制造业基地,温州是产品集散地,云和就是物流中心。如今梓坊、石浦、滩下等地健在的船工和排工还在述说当年的繁荣。



云和从明朝景泰三年置县到民国时期,县城的居民大多居住浮云溪(前溪)和黄溪(后溪)之间的东西朝向的窄长地带。前溪后溪这两条母亲河成为了云和古时天然的护城河,处州十县九无城在云和成了最好的诠释。从明朝弘治年间开始,历任知县就在这片窄长土地上治水,修筑了黄公渠、白水堰、云阳栋等一大批水利工程。被俗称为水碓港的黄公渠,沿绕街区流淌,沿渠立有 4 座水碓,



瓦窑水电站

清清的渠水是古时饮用、生活、灌溉、消防、粮食加工等有着多种用途。早上挑水,下午洗衣、晚上洗澡,不向渠内倒垃圾排污水。古人生活自觉与自律会让今人感到羞愧。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省政府迁至云和,动用政府资源和民间的力量,不到一年时间修建了惠云渠和瓦窑水电厂,成为当年全省最大的水利工程,当时引以为骄傲的电灯最早在浙南山间点亮。

早在明朝之前,山民们就在梅源一带挖掘银矿,开垦梯田。成就了如今层层叠叠,弯弯曲曲的梯田美景。栗溪发现的元代水碓遗址或许就是开矿和垦荒那个时期遗留的产物。明末清初大批的汀州客家和畲民迁徙至云和各地的高山村落,这些乡村大多水源短缺,在山涧沟壑修渠筑堰,灌溉农田,在村子附近挖掘水井,生活饮用。如今村落中遗弃了众多的古老水井,村子附近、溪流山谷遗存着许多精致的石桥。坐落在县城老街西端的天后宫,就是闽南妈祖文化的引入。多数村水口都建有禹王庙,对大禹的崇拜比任何地方更为虔诚。由于生产科技和生产力的落后,干旱年份只得向天求雨,祈雨这类神秘的习俗还传承至今。

自古以来人们对水资源高度依赖,对水量的争夺也不依不饶。民国二十六年大杉葑的分水崖刻就充分说明丽水与云和两县相邻的两个村子,为了赖以生存的水资源,进行了长达上百年的争夺,其过程并未大规模冲突与械斗,而是采用正当途进行有效解决。其程序合理,证据资料保存齐全,整个案件处理的智慧与手段至今仍值得借鉴。

本次普查以水旅融合,服务童话云和大花园建设为目标,按照文化史志记载、文保单位、非遗名录,以及水利风景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为重点采集的原则,调查了渡口、水井、水碓、桥梁、堰渠、水神庙、碑刻、民俗、技艺等 12 类,共 141 项成果装订成册。在调查的数月时间里,我们



进村入户,走街串巷。拜访船帮长者,他们热情地向我们讲述当年航船的情景;当我们调查桥梁、庙宇时,知情人士主动带我们到现场介绍遗址古迹;当我们来到瓦窑水电厂调查,请当地村民来到现场向我们作详细介绍,他望着破败的厂区和干枯的渠道,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来迟了,早几年就加以保护多好”。从基层民众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们也多么渴望这些优秀的水文化传统加以保护和传扬。

在科技日新月异,世界快速变化的今天,瓯江水面货运帆船和岸边拉纤早已绝迹,各地水碓磨坊已经难觅踪影,甚至连木桶挑水都成了乡愁的记忆。我们不是去怀念旧时光里的落后生产力,而

是为了续写几千年灿烂的农耕文明中最辉煌水文化的那一笔,将还要沿着古人的足迹继续探究与寻觅。

(作者:云和县水利局副局长科员)



韩曾萃：我的钱塘江河口科研生涯

□李海静 王森

受访人：韩曾萃

访谈整理人：李海静 王森

访谈时间：2016年5月6日、5月17日、6月17日

访谈地点：浙江杭州市凤起路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会议室



访谈整理者按：

受访人韩曾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36年生于湖北武汉，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曾任浙江省电力厅乌溪江水力发电工程局技术处、工业设计院和水电勘测设计院水电室及规划室、水利科学研究所江道室技术员。1973年后历任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河口海岸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3年后历任钱塘江管理局、河口海岸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钱塘江管理局局长、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钱塘江管理局、河口海岸研究所总工程师、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技术顾问。

韩曾萃长期从事水利河口特别是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的研究与实践，在盐水入侵及水污染防治、水流和泥沙及河床变形、河口河相关及水资源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公开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90余篇，主编和参编中英文学术著作6本，主持完成工程设计图纸及工程规划研究报告40余篇（份）。曾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国家环保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2012年荣获第一届钱宁泥沙科技荣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获水电部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访:1978年,您从事了钱塘江咸水入侵工作,为什么会研究这个问题?

韩:杭州自来水厂85%的淡水取自钱塘江河口段,受下游潮汐影响,每年7—11月份间每15天大概有3—6天取水口外的江水是咸水(即氯度大于250mg/l),这就是咸水入侵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存在。20世纪六十年代,杭州用水量小,通过城河调节、群众储备和城内井水可以解决;到七十年代末,一方面,杭州城市用水量快速增加;另一方面,钱塘江江道因治江工程也更为顺直,造成大潮期咸水上溯。这样,必须通过新安江水库多放水来稀释咸水。同时,1978年浙江遇到了“空梅”,新安江水的水位极低。到了7月中旬,梅雨季节即将结束,新安江水库的水位接近死水位。

这年杭州面临着上游水库无水可放,下游潮汐很大,咸水入侵必然严重,杭州市市民正常供水出现危机。当时省计经委找到水利厅、自来水厂和电力局,要求大家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问我有没有预报的方法利用好新安江水库有限的水资源,避免杭州吃咸水。我说国外有这方面的理论,但却是针对恒定流的理论,针对变化流量的计算,国外尚没有现成理论,更没有用到解决生产实践问题上来。

访: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

韩:当时我提出来,解决咸水入侵预报问题,需要使用计算机。河口沿程的瞬时含盐度分布可以由联立求解水流连续、动量守恒、盐分守恒及状态方程而得,把偏微分方程离散化。如果用手算,计算量极大不可能。如果用计算机来算,可能半小时甚至更短时间就够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钱塘江有六个水文站,积累了丰富的盐度变化实测资料,对每天盐度最高值和最低值都有详细记录。这样,在计算方法和观测资料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因此我敢接这个任务。

我与同事程杭平两人,日夜推导公式、编排程序,然后调试、计算盐度的变化,当我们模拟出主要取水口的计算与实测过程以后,继续研究怎样的放水方法最优。计算结果是大潮时新安江水库向下游多放水,小潮时少放,基本上可以节水20%。

当时工作条件非常艰难,全省只有两台计算机,一个星期只能排两次,每次两个小时,且常排在半夜。我和同事边计算,边分析,边修改,大概花了15天时间完成了验证工作。实践证明,我们的预报结果基本上可以反映实际的情况。每15天就是一次检验,我们经受住了6至8次的检验,自来水厂和电厂都表示信任。因为这项工作,我获得了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那是1980年省里第一次设立科技进步奖。

国际上就盐水入侵的问题有所研究和关注,但尚未应用于实际,我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地将理论应用于实践[3]。盐水入侵的实测预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长江、黄浦江、珠江相继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访:您刚刚谈到使用计算机,在您的研究工作中它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韩:钱塘江的研究在我这一代很幸运地有了质的变化,主要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计算机,很多水力学的计算很难实现。盐水入侵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另外,潮汐、洪水、水污染预报等也是如此。在构建数学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机实现模拟计算。早在1964年,戴总就派有关人员到北京的中科院计算所去学习使用计算机,中科院数学所金旦华与我们有较多的合作。计算机这种强大计算手段的使用,使我们对钱塘江河口海岸的研究由定性描述进入到了定量分析的新阶段。

访: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您所从事的钱塘江研究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韩:钱塘江治理工程一直在逐步开展之中。20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两岸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与钱塘江相关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水污染、水环境方面。当时,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秦山核电厂排污问题。

访:您所做的有关钱塘江下游的秦山核电站放射性废水排放的研究引起了较大反响,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从事了这些研究工作?又解决了哪些问题?

1984年与核电专家踏勘秦山核电厂厂址。

韩:20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计划在钱塘江下游的海盐县修建核电站,我们俗称的秦山核电站。这是中国第一座核电站,核电站修建三个问题:一是,厂坪高程,就是厂址放在什么高程上才安全,沿江海堤如何建设?二是,冷却水的排放位置和取水问题;三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浓度会影响多大范围。于这三个问题,核工业部环保研究部门和省环保所没有资料,对钱塘江杭州湾水文、水流情况也不清楚。多年来,我们做了大量钱塘江的工作,他们请我们介入此项研究。这是一次新的挑战,单位有些人担心和犹豫,怕做的不好影响名声,而我敢接这个任务。我们已经掌握了该水域的多次实测流场,然后可以建立数学模型,模拟流场、温度场、放射性物质的浓度场,就可以保证计算得比较准确。本来他们还要我们做物理模型,负责人有顾虑不敢接。我负责数学模型,北京水科院负责物理模型,结论完全是一样的。我做出来的温度场是 0.36°C ,物理模型结果是 0.40°C 。规范限定温度场为 2°C ,所以很安全。核工业部审查我们的结论,表示很满意。

此后的二期工程还有取水口的淤积问题也由我们负责。通过数学和物理模型,很好地回答了放射性物质影响范围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浙江省作为第一个建核电站的省份,专门成立了核电站安全委员会,涉及水安全、大气安全等问题,

我也受邀成为专家组成员。

因为秦山核电厂水环境研究工作,我的工作被外界所了解。此后,浙江与上海因杭州湾排污问题发生争执,两地打了一场“生态环保官司”。

访:“生态环保官司”?您能讲讲具体内容吗?

韩:这件事发生在1986年,上海打算把闵行和浦东两区每日约70万吨的污水不经过二级处理直接排放到杭州湾。污水排放项目评审没有邀请浙江方面代表参加,上海单方面准备开工建设。时任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副省长吴敏达对这件事表示反对,省政府一方面向国务院写报告,表明上海污水排放对杭州湾和舟山渔场生态环境有影响,一方面要求省环保局做好与上海方面交涉的准备工作。

浙江省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87年5月,国务院决定由国家环保局牵头,邀请专家重新组织召开项目论证会,由中央各部委、上海市和浙江省各派5名专家参会。浙江省方面确定由省环保局总工程师吴宏美、省河口海岸研究所总工戴泽衡和我、省水产厅副厅长吴家锥、以及杭州市规划院院长吴兆申参加,上海方面参会专家有陈吉余院士等。会前,大家仔细研究上海同济大学所出的论证报告,提前做好准备。当我看到第三天时,发现报告中存在一个要害性的问题——就是计算的边界太近。

1987年7月16日,论证会在上海召开。我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并直接质问负责具体计算的青岛海洋学院陈教授,为什么把计算的下边界设置在距排放口仅12km的芦潮港处?他解释说,是根据上海方面的意图而把计算的边界设在杭州湾口,而且他们所拿到的项目经费太少,所以无法扩大计算边界。我指出,如果计算的边界设在合适的更大范围处,那么所排污水质点不是一个潮就可以排出杭州湾,而是需要经过20—40个潮的周期才能排出边界。所以,计算边界设定太近是一个原

则性的欠缺。这样一讲,再加上浙江省其他几位专家从不同角度的质疑和辨析,形势发生了转变。会上,中央的专家说:既要给上海的污水出路,又要确保杭州湾、舟山渔场不能受到影响。这次论证会最终达成三点共识:一是,污水要经过二级处理后才能排放;二是,排放口位置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重新论证污水排放对舟山渔场和杭州湾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三是,在没有得出重新论证结论以前,上海方面要停止后续工作。

省长、省环保局对会议结果非常满意。省水利厅也认识到:钱管局、河口所参与做环境方面的研究是有必要的,应该开展水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时,我参与环境领域的科研工作是一次违背主管领导意愿的“叛逆”行为。对我来说,参加上海这次论证会,是在技术上是否敢于与权威们争议的一次重大考验,实践表明我的观点是经得住考验。

访:从前面我们谈到的几个案例来看,改革开放后,您在钱塘江河口科研服务于社会实际需要方面身体力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富有影响力的工作。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开始从事这方面科研工作的呢?

韩:把工程技术应用于社会,并且为实际生产生活服务,这是我们国家一直比较强调和重视的。钱塘江管理局、河口海岸研究所属于工程应用型的科研单位,就是要跟国家建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生活实际密切结合。当然,在这方面,

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曾经存在很大的分歧。20世纪80年代后,水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省环保部门决策人员和工作人员缺少水动力学方面的专家。这样,他们就需要水利部门专家参与水环境方面项目的研究和咨询工作。在此情况下,单位逐渐的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即60%的力量研究钱塘江治理工程,40%的力量做其他领域的横向研究项目。初期,厅领导明确表态不同意,认为水利河口研究所和钱塘江管理局就是为钱塘江服务的,并提出不认可这方面的工作业绩,不能评职称。

我个人完全理解厅领导对钱塘江治理开发工作的重视,但也坚持认为,我们的科研力量、长期积累的数据资料以及卓有成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可以为各个行业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我们独特的贡献。人们的观念也逐步地发生了改变。正因为我们的工作已为社会作出了有效的服务,单位、水利厅及外界认识到科研的实际价值,所以1989年推荐我做全国先进工作者(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全国劳动模范),这也是对单位和我个人从事钱塘江河口研究所做工作的认可和肯定。

(访问整理者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研究生 中国水利博物馆助理研究员;访问整理者2:科学史博士,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文章转载自《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4期,内容有删减。)

妈祖信俗:

“一带一路”的中国式故事,国际化表达

□车 弓

“妈祖信俗”是东方民族文化自信的民间表达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距离李鸿章带着 126 个大行李箱出使巴黎 121 年后的中国,自然旧貌改了新颜。尤其是近四十年间经济的发展,促使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但我们对于民族文化自信仍然缺乏足够的定力。在城市执掌者与知识“精英”阶层的眼中,常出现目光游离和举棋不定。他们并不明白中华传统文明,是以华夏农耕文明与东方原始海洋文明所结合构成的“原根文化”(包含上古神话与民间信俗),偏颇地推出他们认为正宗的儒家主流文化。

这儿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究竟主流文化是什么?是以两千年来以庙堂(政权执掌者)推崇的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还是蕴藏在民间地域文化精神?如果是以庙堂(政权执掌者)为主体的民族精神,那末历经两千多年几次政权更迭和近



代“五四”运动后的冲击,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其精华部份确实所剩无几,需要有重新认证遴选的过程。如果以民间地域文化精神为主,那末我们优秀民族精神遗产比比皆是。如妈祖信俗,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由华夏农耕文明与原始东方海洋文化相结合,转化为近代海洋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二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共融,需要有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传播。这种沟通与传播建立在文明与发展的基础上。一个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的民族,肯定有其合理的文化内涵可供挖掘与开采。其沟通与传播的手段建立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共同体的相互理解与交往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意向性地传播和输出。

莆田湄洲岛妈祖信俗,是一份发源于东方原始海洋文化、发散传播世界各地、寓儒、释、道一体,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它的意义并不亚于西方“上帝造人”(亚当、夏娃)、“诺亚方舟”人类远古传说;也不亚于“神农氏尝百草”、“大禹治水”与“苍颉造字”等中国神话故事。唯一不同的是,以上传说与神话故事,都由贵族阶层(拥有文字能力的特权人物)以文字形式所记载下来,而“妈祖信俗”却更多地由弱势群体(渔民与市民)中,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开来,继而由文人与民间艺人记载定型,蕴藏在市井与乡绅文化中的民族精神。

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妈祖信俗归类于民俗范畴,即来自民间的地域信俗文化。她从诞生之日始,就有着扎根深植于民间土壤的现

实基础。妈祖林默娘是一个出生于北宋初年的民间女子，为了保佑与庇护出海渔民与来往商船不被突发其来、狂虐无情的海浪吞噬，几乎“自学成才”掌握了“测知天气与海洋风暴的规律”，以她的仁慈博爱精神与“弱小”能力，保护出海来往船只的安全。这对当时农耕文明(含海洋狩猎)向原始商业文明进化的人类转型期(值得说明的是两宋间经济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孕育了原始市民文化的萌芽)，无疑是一种寄托着新兴市民阶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从而产生东方原始海神崇拜；继而才有历朝皇帝的封敕而成为华夏民族除了“龙图腾”外、有着人格化的航海神而享誉世界；致使凡有华人航海与渔猎处，皆有妈祖神祇庙宇的信俗崇敬。相比于高居庙堂的儒、释、道以及外来的天主教等宗教文化，她的组成成份更为复杂，生命力也就更加顽强，且拥有扎实的平民阶层文化基础。

东方民族转型期 所产生的“混元”文化现象

就世界文化精神交融来说，许多都是由民族主流文化(即官方提倡)与民间文化(风俗与信俗)基础上结合形成的。两者不能相互排斥，也不能相互混同；有一个去粗存精、相互包容、依赖发展与传播的过程。

妈祖信俗流行千年而不衰，除了扎根于新兴的市民阶层、合理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外，在创建之始就融洽和包容了流行市井乡间的儒释道混元文化、并充分吸收其合理的内涵；还在于随着时代变迁(人类由农耕文明向海洋商业文明进化中)历朝历代官方提倡以及推崇。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趋向共融的必然。回顾妈祖信俗形成与发展过程，有一点我们不能回避。这就是人类所有信俗图腾，都产生于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蒙昧时期，对物质世界的憧憬与希冀，寄托着人类改造周边环境的美好愿望。如西方海神波塞冬产生于希

腊神话故事。我们东方民族就有龙王传说。几乎世界上所有民族，在其文化精神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原始信俗。而妈祖信俗，却产生于北宋初年而形成在宋末元初的几百年间。究其成因，不但有中国特色的儒学与道家成分，还包涵由印度佛教文化的因素。在妈祖信俗发展和传播过程中，许多地区往往把天后妈祖与佛教观世音菩萨混为一谈。如东海渔民信俗中，妈祖不但识“天体气候”的“天书”为观世音所赐，还有说妈祖就是观世音菩萨在人间的化身……

这需要我们回到本文提出的观点：真是“崖山之后无中华”吗？不对！这儿须得明白我们民族的“原根文化”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在宋至元代，传承千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发生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两桩变化。一是上文提及的两宋间“穷兵黩武”、社会风气趋向“文弱”；由此造成北方游牧民族乘虚而入而使中原传统文明“断裂”与“分化”；致使南方以古越民“水文化”或称之为东方原始海洋文化“抬头”，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补充(元代的疆域扩大了数倍)达成华夏多元文化的特征。二是中国的封建农耕文明，在两宋时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由于宋代推行兴修水利和南北运河的贯通，大片的农田得以灌溉；社会生产力超过中原地区得以发展。如果你有心查一查，南方有名的古水利设施，大多是在那时期开发的。大量的农田开发和南北大运河贯通漕运，促使一部分农民脱离“本业”，转换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并对海外进行商业贸易(在两宋间苏浙、闽广孕育了扬州、宁波、泉州、与广州、交趾等五大港口)。元代承继了两宋“市舶司”通商模式，造成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商贸的繁荣(这种情况在马可·波罗《传记》中即有反映)。这些新兴市民阶层的产生，急剧需要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与时代特征的信俗崇敬；而妈祖信俗，则顺应了这一时代发展的需要。

据此角度，我们可以得出妈祖信俗源于民间

渔民捕捞作业,而符合新兴市民阶层利益需求的基础上孕育、发展和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华夏民族对外开放、吸取外来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混元”文化现象。得以传播的因素是南宋灭亡致使华夏文明主流文化带暂时“休克”,而民间文化仍持续发展、顺应时代要求上升至地域主流文化。这些虽由于明清两朝“海禁”略事“停顿”,随着南北运河“漕运”与“五口通商”后和海外日益见长的商贸活动而勃兴,并向中国内陆与世界发展,形成至今方兴未艾的东方海神——妈祖信俗崇敬……

民族地域文化 与当前“一带一路”的意义

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共融与相互包容促使民间地域文化的发展;正因为妈祖信俗在时代变迁中汲取“外来文化”、形成民族“混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于与西方缺乏沟通、以儒学为代表的正统主流文化更具有生命力。

就妈祖信俗传播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它形成基础建立在中国民间儒、道两家,内涵却包含佛教文化元素、甚至有与阿拉伯波斯商人沟通的文化基因。它与西方海神波塞冬既有“佑民行善”的共同性,又有明显的区别特征:一是西方诸神皆有“出身”(如波塞冬是希腊神话传说的神祇),享受“庙堂”的荣光,代表着有产者的利益。而妈祖并不是东方神话中的原始神,他“半路得道”代表平民阶层的利益。二是构成妈祖信俗的核心是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无一害”,弘扬东方民族善良的原始本性。而波塞冬则为了维护有产者利益,更多体现在财富掠夺与“侵略性”。两者相比,西方文明更具开拓性,而东方文明相对兼有包容性。

历史选择“回归”,当经历明、清两朝“闭关锁国”、停止与世界接轨与交流,导致优秀民族精神的“沦丧”,我们遭遇了新的“文化壁垒”与“断层”。在今天世界经济、文化共融发展的大趋势下,党中

央提出“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构想,是中国高层选择与世界经济和文化“握手”的战略决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领袖地位,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初步估算沿线总人口达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分别占全球人口63%和经济总量29%。说句不谦虚的话,这将是本世纪最大规模地与世界经济、文化“握手”。将彻底改变东西方对话的经济与文化格局。

这就是妈祖文化精神。它是一种产生于某一特殊地域、形成与发展于某一特殊时期,从没高居“庙堂”之尊,又长期为“庙堂”所用,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基础、代表民族文化自信的民间信俗,没有完整理论(或说宗教精神)支撑,却能千年不衰、至今在世界上拥有三亿信徒、流传于四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文化现象。莆田市政府、莆田学院举办“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暨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在当今迅猛发展的世界经济、文化共融、“一带一路”发展格局的时代大背景下,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就世界文化走向说,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当今时代变迁、经济文化交融的洪流中,每个地域、每种习俗都有自己的“故事”可讲。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这些“中国式故事”,涓水归流地进行“国际化表达”,使更多的人了解与参悟中国文化精神。如果我们把城市故事讲深讲好了,也就把“中国故事”讲深讲好了。而这些,不是靠几个“文化精英”,策划与归纳口号可以解决的。因为“城市故事”蕴藏在每个市民的骨髓里、溶化在血液中。我诚挚地祝贺此次论坛的举办者为民族文化的表述,在世界文化讲坛上争得一个“金话筒”。

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也就走向了世界。这就是每个中国人酝酿在心中、身体力行的“中国梦”……

(作者:原名张建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来源:微信“宁波水文化”2018年5月14日,有删改。)



水上乡愁

□黄美丰

摄影：刘海波

今日芒种。

栀子花的香气在暗夜中浮动。而我照例从缠绕多年的梦里醒来。梦中，仍是十一二岁的少年，同街坊邻里的孩子们一起，在河里几排长长的木筏中，嬉戏玩闹。河水溅湿了衣裳，赤足的我们却仍在奋力从这端跳到那端，不知疲倦。

醒来时，窗外大雨滂沱。我的心里，却有如回到故乡般地恬静喜乐。故乡在乌溪江边的一个小镇，一个码头。三十年前，河床宽阔，河水碧绿如练。“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年少时的记忆里，最深切的便是停在河面上的一艘艘木船，和头尾相接连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排”的长长的木筏。河边长大的孩子，个个无师自通会点水性，最爱做的事便是在木排之间游来游去，如鱼儿般穿梭。岸上，咫尺相望的地方就是天妃娘娘庙，是水上讨生活的人家最敬奉的神祉。我人生第

一篇成为铅字的文章，便是初一时发表在县里《语花报》上的《天妃娘娘的传说》。

后来，通了公路，水上交通渐渐被陆路取代。河床也在渐渐变窄，似乎念初中之后便再未见到木船的踪影，那些长长的木排也去了远方，熟悉的场景停留在记忆中，成了我的水上乡愁。曾以为，今生，再不能见到这样温柔的旧时光景。帆影点点只在梦里重逢。

直到某天来到云和。

其实与云和是邻县。相隔不到一百公里，却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童话世界，小县大城。而我却忽略了，它是个瓯江边的小城。

第一次去云和，是同几位友人，去看在云和工作的朋友。甫一踏上这片土地，看到浮云桥下，一湾碧水环抱着县城，如婴儿在母亲怀里安睡般的宁静气象，这样的城市无端地就让我生出几分欢

喜来。

当晚住在一条游船上。当地人叫这种船叫“舴艋舟”，我不知道云和的舴艋舟是不是能载动许多愁，但是那晚，我确定它是承载了我的几许乡愁的。长月当空，游船上，友人们就着啤酒啃着鸡爪，海阔天空地闲扯，倒是颇有几分“移舟泊烟渚”的意境。面对瓯江，我絮絮叨叨地和朋友们讲起了我的乌溪江，我的童年，童年里的那些帆影和木排。明月映着轻烟笼纱的江面，有一点清冷，友人们的童年记忆被悉数勾起。

于是有了第二次的云和之行，看水看云看帆影。这一次，我知道了，那晚住的是紧水滩镇菖蒲菴村，那艘船，叫做“仙宫画舫”。白天的瓯江如玉般通透，画舫的边上，停着三四艘小木船，白色的帆影倒映着碧绿的江面，云朵儿在天上慢悠悠地走着，一切都如梦似幻。不知是否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江的对面，一行白鹭呼喇喇从江面飞起，星星点点飞向迷离的远处，隔着江岸，我仿佛听到了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在这水云间里，忽然想，此生，就做一个渔家女子，在湖光山色中捕鱼织网，吟赏烟霞，老死于山水之间，似乎亦是甘心的。

而真正给我大惊喜的，是石浦村。石浦村，在菖蒲菴的对面，是当年瓯江船帮生活的重镇，在童话云和的一隅，默默地记录着瓯江船帮风起云涌的历史。站在村口，长长的甬道入口处写着：船帮老宅。我如同坠入梦境般跟着老村长往村里走。

是的，如坠梦境。是水边人家共有的特征吗？这长长的堤岸，堤下的埠头，水中的汀步，两旁的吊脚楼，青石板，鹅卵石，与我的儿时记忆，几乎一模一样。船帮有会所，会所里有庙宇和戏台，庙里供奉的自然“天妃娘娘”。“天妃娘娘”在其他地方多叫做“天后娘娘”或者“妈祖”，而这里与我家乡叫法相同，为着这个小小的一致，莫名地又让我生出一份亲切来。昔日船帮出发前，都要来庙里祭

拜娘娘，祈求一路平安。到如今，每年正月十四到十六，这里仍有盛大的庙会，家家户户点香燃烛恭迎盛装出巡的夫人。我的老家亦有此风俗，只是时间不同而已。这种有着强烈仪式感的习俗，既是水边人家的一种祈福方式，更是船帮人怀念彼时生活的一种形式吧。

站在堤岸边，仿佛看到当年集镇的繁华和船来人往的热闹。想佳人妆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这样一个码头古镇，承载了多少的记忆和离愁，又记录了多少的重逢和欣喜。一个码头，分明就是一部船帮的历史。还有老村长。他是昔日船帮的一员，曾经穿着船工特有的装束日复一日在瓯江上讨生活。他在向我们介绍瓯江船帮的历史，我却听出了一份沧桑与惆怅。看着他，我仿佛看到小时候经常看到的那群穿着坎肩似的衣服、长到膝盖的袜子的船工，乡人统称他们为“摇排人”。脑子里有一首多年以前的歌在飘啊飘：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仓……——他就是一位老船长。见证了瓯江船帮最后的繁华。

那是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瓯江船帮，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瓯江流域文明的重要标志。与我的老家相同，交通欠发达的时代，沿江边的地区，水



摄影：刘海波

上运输至为重要。千年前瓯人设计制造的双体独木舟是当时重要的运输工具,也就是如今的“舢舨舟”。船帮的形成,既是为了水上运输的安全而结伴,亦当是当时的一种商业资源共享模式。面对险滩暗礁,盗贼蜂起的运输环境,同舟共济是船帮人无可选择的方式。大多时候,船帮关乎生计,大是大非面前,却关乎民族大义。明嘉靖年间,热血的船帮汉子,在倭寇横行时,义无反顾地驾着聊以谋生的船只加入了戚家军,青田一役重创倭寇,两位船工却也不幸罹难,石浦村的一个山坳里,至今还静卧着两座古墓,那是船帮人的追思,也是船帮人的精神荣光。

明代之后,在晚清闭关锁国政策下,繁荣了两千年的“海上陶瓷之路”黯然消失,瓯江船帮沉寂经年。直到抗战期间,船帮又重振旗鼓,承担了运

输物资的重任。瓯江上重现帆影点点,船只穿梭忙碌的景象,为抗战解了燃眉之急。

然而历史的脚步快速向前,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小小的木船终究敌不过强势的陆路交通,船帮历经繁华与沧桑,成了八百里瓯江最后的记忆。小舟从此逝,如老村长般的最后一代船帮人,也只能在无数个风起的晨昏,留恋地再去看一眼瓯江。想得厉害时,便重操一回旧业,蓑衣斗笠,一叶孤舟,满足游客新鲜感的同时,也算是聊以一慰他们这解也解不开的水上乡愁吧。

而今夜,我与瓯江同在,与船帮同在,且让我在江水轻轻的拍岸声中,将这颗同样充满着水上乡愁的心,在瓯江边轻轻安放。

(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摄影:刘海波



初春天气微凉。站在廊桥之上，感受晨风拂面，已颇有几分凛冽的寒意。阳光尚未来访，青山、绿树、房屋、廊桥，依然沉睡在濡湿的酣眠之中。街道安静寥落，目之所及，车少人稀。晨曦中的小城，透着极致的安详之美。

廊桥跨过的这条小溪，是瓯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鹤溪，古称沐鹤溪。城以溪名，亦称鹤溪。我曾在小城生活十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而今穿越时间之径故地重游，眼前的种种景象被晨雾笼罩得影影绰绰，似乎多了一点扑朔迷离的神秘味道。

诗人曾经写过：“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幸运”。“幸运”两个字，多么简洁磊落，道出了河流对城市的种种恩惠。一条河穿城而过，这城便显得灵动而富有意味了，这城的春天，便是青草粉桃、林木葳

蕤，和着泥土、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芬芳而悠远。

有了河，城市也便有了底蕴，有了故事和传说。鹤溪的源头连着一个大儒的名字：浮丘伯。相传，浮丘伯为秦末汉初人，为避“焚书坑儒”之劫难，携双鹤隐居此间，滨溪垒石，筑台垂钓，沐鹤于溪，溪乃得名。传说中的浮丘伯法术无边，他驱鬼辟邪、降精伏怪，助一方百姓安居乐业。此为鹤溪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始。大约 180 多年后，山水诗开山鼻祖谢灵运曾经沿鹤溪溯源而上，住在溪边一农户家，被年轻的农家女以巧对嘲弄了一方，令这个以才情闻名的山水诗人感到无比狼狈而又别有一番趣味。与传说中的浮丘伯和谢灵运的故事相比，鹤溪边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要晚了 1000 多年。明景泰三年（1452 年），因“山谷险远，矿徒啸聚”为由置景宁县，始为县治。河流才是

一切人文的起始,它为传说装上脚,为故事插上翅膀,将它们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于是,一个地方又多了些旷古和辽远,令人浮想联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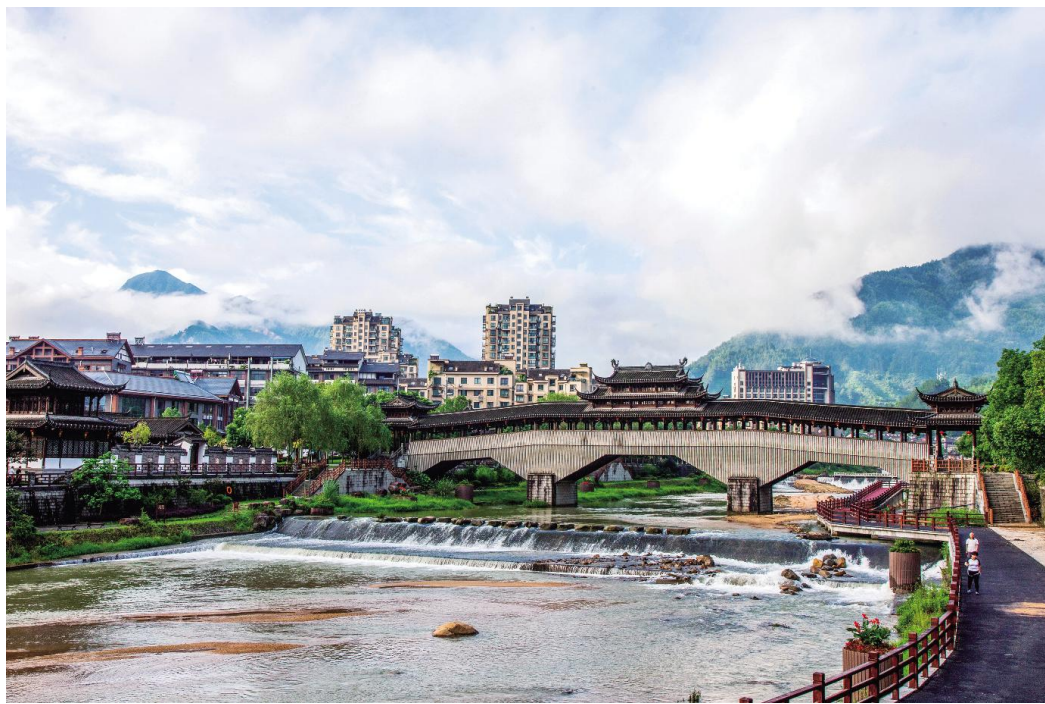
我在小城景宁的十年生活,除了那些每个人在青春年少时期都会经历的理想、激情和莽撞的往事,小河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主角。那时,我喜欢骑着自行车绕鹤溪一圈又一圈地转,看阳光在河岸碧绿的枝叶间跌落,看春天的繁花、秋天的落叶、晨起的舞者、晚归的故人,还有夏天临水的排档里,氤氲酒气熏醉了一座城。

当然还有文字。每一个热爱文字的人,几乎都要写一篇关于家乡小河的文章。文章的字里行间必须饱含深情,其中有生命的源起,有远古的传说,更有对馈赠的感恩。而我关于鹤溪的文字,是迄今为止写过的第一篇小说。在这篇题为《往事在水中飘逝》的小说中,我虚构了一个叫“清水湾”的地方,在那个一听就是清凌凌的小村庄里,少年的

“我”经历了一些奇特的往事,多年以后,当“我”从异地回到家乡,才发现家乡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小河的上游一家化工厂正冒着浓烟,河水象酱油一般泛着白沫,在河中我看不到自己的倒影,面对褐色的河水我知道它已经无法给我答案,在回家的路上,我的信心开始动摇,我怀疑我是否真的在一个叫“清水湾”的地方生活过,或许那一些都只不过是昨天梦境中出现的一部份情节罢了,因而它的真实性大可受到怀疑。

如今看来,小说稚嫩的文笔令人脸红,但文字中被污染的小河却并非虚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在景宁生活过的人,对此都有切肤之痛。创办于1958年的景宁县造纸厂,建于县城的上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是当地最大的企业。造纸厂的污水就直接排放在鹤溪里,冒着恶臭的“酱油水”穿越县城,沿着小溪流域流向下游的青田、温州,在数十年时间里,成为上百万人挥之不



摄影:张光林



摄影:张光林

去的梦魇。

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会让许多人在这个可怕的错误阴影中生活一辈子。我庆幸自己处于一个人们有勇气纠正错误的时代。上个世纪90年代，造纸厂关停，之后，又花了十多年时间，鹤溪才重新恢复了它本来面目。偶尔在电视上看到，鹤溪河畔出现了垂钓者的身影，还有绿草如茵、飞鸟盘旋的景象，总是会心动一下，再动一下。

多年前，我以小说表达了对鹤溪的纠结情感，用文字对内心的美好假象进行了否定。而今故地重游，我仍然为记忆中作为青春背景的那条黑臭河深感遗憾，亦为面前的清澈溪流而喜悦。浮丘伯及双鹤的传说，已然化为纸上的时光碎片，但鹤溪清水依然会年复一年奔涌不息，滋养着这一片土地。

河流孕育生命，亦赋予一个地域以鲜明的个性。清代诗人潘援在《沐溪春水》中写道：“沐鹤仙人去不还，沐鹤溪水清且闲”。“清且闲”，并不仅仅是鹤溪流水，亦指生活在鹤溪两岸人们的性情。曾经有人概括过丽水各地的地域性格，其中，说到景宁人的时候，是以“喝酒赏月当和景宁人一起”来形容的。这种隐逸的情怀，跟山水有关，也许亦跟人文始祖浮丘伯的隐士身份有关。

一条清凌凌的河流，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幸运。我想，每个人都向往这样的生活：在河边建一所房子，春观落花、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然后，无所事事地喝酒、聊天。虽然，这个理想有点遥远，但我为自己这个念头而开心了许久。

(作者:原名吴小东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夜宿浙江

孙 逖(唐)

扁舟夜入江潭泊，露白风高气萧索。
富春渚上潮未还，天姥岑边月初落。
烟水茫茫多苦辛，更闻江上越人吟。
洛阳城阙何时见，西北浮云朝暝深。

越中秋怀

李 白(唐)

越水绕碧山，周回数千里。乃是天镜中，分明画相似。爱此从冥搜，永怀临湍游。一为沧波客，十见红蕖秋。观涛壮天险，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岁晚悲东流。何必探禹穴，逝将归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